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 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陳 孟 君 *

提 要

本文第一部份說明唯有討論董啟章在自然史三部曲之前的小說，才能瞭解其創作初衷與延續迄今的議題。第二部份分析英殖民神話的論述策略，包括物種與文明、海洋殖民與考古人類學、命名與權力。董啟章小說採取以文化詮釋為本質的偽考古人類學，為殖民神話的論述策略另啟假設與概念，賦予考古學以新議題，翻轉殖民地被詮釋的位階，以期提煉香港在回歸前後的地圖想像、地方屬性與歷史起源。尤其，面對九七回歸中國版圖的領屬權，董啟章小說指出更迫切的是，如何回歸香港／回家，怎樣以圓形時間回溯歷史起源，進而揭櫫複雜的時間形式與歷史巨網。循此，第三部份剖析董啟章「故事新編」撈泥造陸的洪水神話，輔以內在英雄的歷險歸家，尋找精神新生的起源價值。此乃體現世界性的神話思維，旨在揭示歷史想像中虛構性的內涵與癥結，反撥殖民神話或當權者的世界觀。即以「家」，思索歷史起源，有別於殖民神話以「他者化」的商業繁華與線性時間定調港史起源，但混雜的香港性難以割捨殖民者

本文於 103.11.12 收稿，104.03.04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DOI:10.6281/NTUCL.2015.03.48.05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造就的城市商業。對此，董啟章對香港文學作出深刻的期許：以圖書館與廣場的互為投影，強調文學應關注歷史、商業、大眾文化等公共議題，此乃新釋洪水造陸神話的啟示。這既賦予文學虛構新視野，更一改標榜填海造陸與商業發展的殖民神話所暗藏的虛構性。

關鍵詞：地圖、虛構、神話、考古人類學、歷史想像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Maps, Myths and (Pseudo-) Paleanthropology: The Path to the History of the Imaginary City in Dong Qi-Zhang's Works

Chen Meng-Chu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ceeds in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nvestigates Dong Qi-Zhang's novels writte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his *Trilogy of Natural History*, and thereby explores his original writing intentions and primary concerns to date. The second part elaborates on the writing strategies of British colonial myths, which includes naming rights, species, civilizations, maritime colonization, and paleoanthropology. With pseudo-paleoanthropology that feature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Dong not only formulates new hypotheses and concepts on these writing strategies but also raises new archaeological issues. By enhancing the inferior status of the colony, he highlight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local attributes,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Hong Kong around the transfer of its sovereignty. Dong's novels indicate how to return to Hong Kong/home, how to trace its origin along a circular timing axis, and how to uncover the complex form of time and the intricate web of history. The third part of this paper analyzes Dong'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lood myth in which lands are created with mud, and demonstrate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spiritual rebirth with the hero's return from his adventures. Dong's novels embody a universal thinking of

* Doct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yths, reveal the essence and crux of the fiction embedded in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oppose the worldview of colonial myths and power holders. He starts to trace Hong Kong's origins with the concept of "home," and this is distinct from the colonial myth that constructs Hong Kong's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a linear timing axis and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brought by others. Since the mixed heritage of Hong Kong tightly connects with the commercial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colonists, Dong's novels reflect his lofty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s literature. Through the mutual reflection of the library and the square in his novels, Dong argues that literature should raise the issues of history, commerce, and popular culture.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d creation myth opens up new fictional horizons for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challenges the fiction behind the colonial myth that links Hong Kong's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o the conduct of creating land out of mud.

Keywords: map, fabrication, myth, paleoanthropology, historical imagination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 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陳 孟 君

一、緒 論

香港文學與城市的歷史文化緊密互動，呈現的主要議題是，如何多元地再現城市風貌，怎樣回應九七回歸。前者如西西的童話香港，辛其氏、黃碧雲、鍾曉陽的精神囈語，亦舒、張小嫻的都會女性故事，海辛、張君默、陶然的市井喧囂。後者如劉以鬯《一九九七》的憂慮茫然，黃碧雲《失城》的身分追尋，李碧華《胭脂扣》的懷舊尋根，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的自我放逐。尤其，香港小說受商業的發展與價值觀所影響，使備受現代主義薰陶的劉以鬯、西西、梁秉鈞等致力於以創作面對雅俗混雜的城市。¹ 因此，趙稀方的研究，為

* 謝謝審查委員不吝賜正，筆者受益良多，已盡力修訂，在此謹致謝忱。

¹ 黃雅蓮：《香港文學與文化身分：以劉以鬯、西西、梁秉鈞為個案的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黃錦樹先生指導，2011年）。香港文學雅俗之辨的相關論文不勝枚舉，黃繼持和盧瑋鑾足堪代表。參見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年）；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此外，研究香港文學的臺灣碩士論文還有：黃鈺萱以70、80、90年代的鍾曉陽、西西和董啟章為例，考察香港作家如何進入臺灣文壇，以及怎樣與之交流的狀況。林藍馨追溯也斯、西西、大江健三郎、波赫斯、巴赫汀、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對董啟章創作的影響。黃鈺萱：《臺灣文學場域中的「香港」：以鍾曉陽、西西、董啟章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陳建忠先生指導，2011年）；林藍馨：《想像世

彰顯本土性、都市性、商業性、大眾性交織而成的香港意識，遂由東西之間形成的後／殖民書寫與文化想像切入，從島與大陸開啟中國香港與中原心態的對話。²董啟章的小說匯聚這些關懷，更是承繼劉以鬯、西西的中生代代表作家，學界主要從性別、物件與空間予以研究。例如，梅家玲、許琇禎、謝嘉琪從女性主義的視角進行討論，王德威分析《地圖集》企圖將香港歷史空間化，胡金倫、鄒文律指出自然史三部曲由物件思考香港的時空意涵。³

本文以迄今的研究成果為基，進一步指出影響香港文學的、或香港文學省思的商業金融，其癥結攸關英殖民神話的操作策略與歷史論述，故本文不同於前人研究有二。其一，輔以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等史料文獻，彰顯董啟章以（偽）考古人類學的敘事策略和洪水造陸神話的故事新編，旨在與「殖民神話／帝國論述」形成複雜的辯證，反思回歸前後的地理想像與歷史起源，進而揭示商業城市中歷史成為公共議題的路徑。其二，隨著自然史三部曲（2005-2010）備受各大文學獎的肯定和讀者的矚目，董啟章的知名度與日俱增，於是出版社陸續出版其舊作，其中，歐美日最為推崇《地圖集》，以多種語言翻譯。其實，《地圖集》最早在九七年出版，已為香港文學劃下標誌性意義。由於此時高漲的本土意識帶動文壇以懷舊為主流，但《地圖集》以前衛又陌生化

界的宇宙獨裁者——董啟章小說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學碩士論文，胡衍南先生指導，2010年）。

² 趙稀方：《小說香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³ 梅家玲：〈閱讀《安卓珍妮》——雌雄同體／女同志／語言建構〉，《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許琇禎：〈回歸女性本質的烏托邦建構——論董啟章〈安卓珍妮〉的雌雄同體意識〉：《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29期（1998年5月），頁143-155；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輯錄張美君、朱偉耀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頁319-341；胡金倫：〈獨裁者坐在文字工場裏騎旋轉木馬〉，《聯合文學》23卷6期（2007年4月），頁109-111。鄒文律：〈人與物件的時光之旅——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年12月），頁231-268。此外，鄒文律援引傅柯的他者空間理論研究董小說，《城市書寫：董啟章小說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碩士論文，樊善標先生指導，2006年）。

的實驗：歷史的物質載體——「地圖」的虛構知識，開啟以殖民地歷史為核心的城市書寫，為香港小說史注入一股異數與前瞻。本文以董啟章的創作歷程為出發點，發現《地圖集》思辨的議題已出現在此前與稍後的小說中，如《名字的玫瑰》、《衣魚簡史》、《繁勝錄》、《安卓珍妮》等。這些前期創作更埋下 2005 年成名作以降仍持續深化的議題，故本文以前期作品為分析對象，才能瞭解其創作初衷與關懷。

上段中，其一的重要性在於，英殖民帝國運用各種敘事話語，「合法化」其佔領香港的權力位階與歷史事件。例如，依據英國意象來命名香港的街道或建築，這不只是為了以熟悉的英國地景來緩解對香港的陌生感，更企圖將殖民地香港論證為英國歷史敘事的一環，以期強調香港本不屬於中國，反而源自英國的殖民統治，香港才得以出現在世界版圖之中，或者說，才能在世界中具備較高的能見度。這某種程度可由薩義德（Edward W. Said）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予以印證。不僅如此，趙稀方指出，英殖民者在香港建立印刷媒體，壟斷中英報刊等敘事文本，幾乎全面宰制香港的歷史敘事。循此引發的效應是，十九世紀涉及香港書寫的英國小說，呈現種族歧視的殖民眼光，二十世紀的英國小說則在敘事策略上稍有轉變：自居於從事啟蒙事業，向香港輸入現代文明，實則以此名義，掩飾對港人的蔑視。⁴此外，英殖民者為抵制香港的民族主義，起初致力於養成港人對西方的認同，其後則認知到香港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係，遂改而提倡國際化的世界觀。王宏志稍有別於此，強調港人比較研究東西方的思想時，應以中國語文、歷史、思想為基礎，才能自覺自身文化的優勢，又持有開明而國際化的世界觀，從而成為一位名符其實的現代中國人。⁵換言之，香港當代小說唯有綜論東西方的思想文化，而非獨尊西方，才能拆解英殖民神話打壓香港本土內涵的意圖，但這並非二元對立地解構之，綜論東西方的

⁴ 趙稀方：《小說香港》，頁 18-33。

⁵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5-17。



必要性將於後文說明。⁶

綜上，英殖民者樹立殖民神話的合法性論述乃建基於：命名權力、文明啟蒙、國際化的世界觀，而這三項也是隨著歐洲航海殖民而興起的考古人類學所關注的議題。考古人類學攸關殖民主義與國族主義，從發掘、調查、命名到地圖製作，無不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建構。誠如 Nadia Abu El-Haj 表示，十九世紀末，英殖民者由考古學家與地理學家組成探險隊，繪製以色列地圖，企圖藉由考古學為以色列的殖民主義、歷史想像與版圖擴張，提供合理化的論述依據——符合殖民需求與印證聖經的真實性。⁷ 英殖民者同樣也將香港地圖領屬化（territorize），於是，董啟章的小說意圖與殖民／考古學展開不同的論述視角與歷史關懷。

上文已說明本文聚焦在 2005 年成名作之前的小說，故第二部分以《地圖集》為主，輔以〈西西利亞〉（1992）、〈名字的玫瑰〉（1992-1993）、〈安卓珍妮〉（1994）、《繁勝錄》（1998）、〈那看海的日子〉（2000-2002），旨在爬梳董啟章的小說在回歸前後的語境中，回應殖民歷史時，如何採取、重審與轉義殖民帝國的話語策略，包括物種與文明、航海殖民與本土考古、命名與權力，後文將說明這幾項怎樣形成小說中想像歷史的層次與路徑。誠如董啟章曾表示：「發展出一套處理自身現實經驗的個人方法論，在都市亂象中為自己整理出一些方向。」⁸ 上述的小說或偏重理論，或以象徵情節為主，或聚焦在九七回歸的反思故事，而〈永盛街興衰史〉（1995、2014 修訂）稍有區別，

⁶ （德）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國家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年），頁 337-360。建構國家神話／殖民神話的方式，是將政治話語普遍地推廣為日常語言的一部分，將官方意識形態潛移默化為人民的認知，由此塑造政權的合法性與神聖性，但也因粗暴地宰制民眾的思維，而使神聖權威蒙上一層虛構。

⁷ Nadia Abu El-Haj, *Facts on the Ground.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and Territorial Self-Fashioning in Israeli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⁸ 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輯入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95。

以地圖想像切入，使故事情節較好地融合具體又龐雜的歷史事件。因此，該文在兩千年之前已備受肯定，可視為《地圖集》的前導之作。⁹ 職是，本文第三部分以第二部分歸納的敘事策略／史觀路徑，細讀〈永盛街興衰史〉在九七回歸中國版圖與時間回歸的辯證中，如何闡釋歷史想像的虛構內涵與癥結。此乃本文不同於前人對〈永〉的研究之一，不同之二是，〈永盛街興衰史〉、〈衣魚簡史〉、《繁勝錄》等不止於批判：標榜商業發展與填海造陸的殖民神話，更故事新編洪水造陸神話，以滄海桑田的空間變化映顯殖民歷史的魅影，還強調文學虛構與公共議題的對話乃不可迴避大眾文化和商品經濟的影響，循此為香港性注入的生命力，一反殖民神話暗含與窄化的虛構性。公共事務攸關董啟章處理身分認同的自我定位，以及期許香港文學的寫作關懷，是其小說的特殊價值。

二、偽考古人類學的新釋

（一）虛構的歧異性：地圖、航海殖民與本土考古

董啟章於回歸前後創作的 V 城系列小說中，《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是由「理論篇」、「城市篇」、「街道篇」、「符號篇」四章組成，揭開考古實證與想像城市之辯證。例如，「城市篇」中，〈海市〉一節表示：

現存的一批測繪精粗有異但卻資料頗豐的維多利亞城地圖，並不足以作為它的存在的明證。相反地，這些地圖質疑了它的恆定性。閱讀這些地圖，就像揣測情人的心貌，在那反覆、曖昧、不確定而又充滿暗示的表現背後，讀圖者的知識和想像力將會走進曲折的敘述中，讀出各種充

⁹ 小說年代依據《繁勝錄》附錄的年表和《名字的玫瑰·序》。2014 年聯經版的〈永盛街興衰史〉稍有別於聯合文學版，因不清楚董啟章重新潤稿的確切時間，遂以出版年為準。

滿著偏見、嫉妒、誤解、迷惑、焦慮和狂喜的小說。¹⁰

由於地圖的繪製，取決於觀看的角度和位置，再加以，《地圖集》透過讀圖展示不同的論述視角和迥異的視覺敘事，地圖的內涵隨之變化，而非恆定不變，甚至呈現不確定的暗示與曲折的想像力。此乃取代地圖本應具備理性、科學、數據等工具性質，以期揭穿地圖敘事曾淪於闡揚英帝國的殖民神話，故其中暗藏有待商榷的偏見與爭議，包括：對土地的擁有權、剝削權、解釋權；對沒落權力的嘲笑；掌控虛構的權力；現實中的國界或地界在抄襲地圖等。循此，《地圖集》使地圖轉為一個多義的文化符號或文本空間，是一方由各種論述相互交鋒的複雜場域，議題以主權、知識、夢想、回憶為主。

當你因為任何原因而在轉換中獲得或失去地圖，你也未必弄清楚，究竟你最後移走了的是地方本身，是主權、知識、夢想，還是回憶。¹¹

殖民者為了鞏固主權所建構的知識體系，是滿足帝國夢想嗎？這之於港人究竟是集體記憶，抑或，知識與回憶淪為虛幻的夢？由於這些議題的癥結是虛構，本文遂以之為切入董啟章小說的視角：由「虛構的殖民神話（論述）」與「虛構的小說想像」之對話，重新詮釋香港的空間意涵，尤其凸出虛構的歧異性與多義性。

朱耀偉精闢地指出：

九十年代香港小說中的城市不再劃地自限，更完全脫離了再現香港的次第，甚至不再停留於如何虛構香港的論述方式之上，而是進而考量虛構與香港之間的相互關係。¹²

例如，《地圖集》中〈蜃樓〉節錄《委洲喜野漂流記》所紀錄的維多利亞城見聞，預告由移民匯聚而成的香港，不僅以漂流為特質，更以海市蜃樓的虛構性與想

¹⁰ 董啟章：《地圖集》（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7年），頁65。

¹¹ 董啟章：《地圖集》，頁49-50。

¹² 朱耀偉：〈小城大說：後殖民敘事與香港城市〉，《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頁261。

像性為基調。再以〈維多利亞之虛構一八九八〉（plan of Victoria 1889）為例：我們可以看見城市的發展已經頗具規模。街道網絡已經由上環、中環、下環組成的中心地帶向外延展，西至堅尼地城，東至銅鑼灣，南面向山坡上太平山一帶擴建，而北面則把海岸線向海港推移。從遠距離看，這幅單色街道圖就像一張發黃的攀援狀植物生態素描。¹³

引文以植物生態素描來形容維多利亞時代的香港街道地圖與城市規劃方案，這既呼應英殖民者在航海時代所熱衷的植物誌與殖民地資源的研究，還反映填海造陸與向外延展的殖民政策。然而，該文竟以虛構為篇名，顯示每一張此刻繪製的地圖，對於不斷變化的未來而言，將成為一幅幅虛構的地圖。或者說，地圖曾承載一段虛構的大歷史，致使小歷史的失落。誠如也斯表示：「懷舊並不是指向歷史，而是指向歷史的消失。」¹⁴ 朱耀偉同樣指出：「當記憶和虛構被自覺的混為一談，敘事和城市之間的穩定關係也就蕩然無存。」¹⁵ 這可由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主張，予以說明：作為文本的城市，意符不斷指向其他意符，而非指向穩定的意符。¹⁶ 亦即，以地圖為文本之一的城市書寫，既與虛構互為表裏，且與虛構俱為文本，使《地圖集》描繪的香港是開放性與動態性的「衍異過程／文本」，因此，如何詮釋歷史消失、交鋒或再生產的來龍去脈，是虛構小說／文本的重要議題。

王德威表示，《地圖集》以「考古學」為副標題乃借鏡傅科（Michel Foucault）《知識的考掘》，¹⁷ 本文有鑑於上段最末的小結，認為副標題兼備知識的考掘與人類學的詮釋此二層面。由於戰後西方檢討人類學與殖民主義的

¹³ 董啟章：《地圖集》，頁 77。

¹⁴ 也斯：《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5 年），頁 25。

¹⁵ 同註 12。

¹⁶ 羅蘭·巴特著，王志弘譯：〈符號學與都市〉（Semiology and the urban.），輯錄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出版社，1993 年），頁 527-538。

¹⁷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33。

關係時，指出人類學家願意將殖民地的研究成果，獻給殖民政府作為統治政策的參考。¹⁸簡言之，本文強調人類學的視野，才能彰顯與剖析英殖民者論述地圖的權力動機，乃挾帶或操作考古田調的成果，本文循此再由「文化詮釋」來重審當代香港社會中我／城的心靈樣態。詮釋的重要性在於，使單一的權威論述與多元的歧異想像得以在同一個議題平台上對話。誠如德勒茲〈從當事人的觀點〉揭示，人類學者不可能成為研究個案裏的當事人，頂多越來越瞭解或貼近當事人的觀點及其文化脈絡，由於人類學者的瞭解，是建基在對該文化的詮釋之上。職是，考古田調可稱作是文化詮釋，亦即，處理一個表達系統的意義如何在另一個意義系統較為貼合地表達出來。¹⁹此乃說明《地圖集》以「（偽）考古學」為敘事議題與敘事策略的旨趣：詮釋英國殖民史與香港文化的交鋒，另啟更深層的假設、瞭解或概念，從而提煉香港的地方屬性。

至於（偽）考古人類學的「偽」，意義有二。首先，董啟章的小說並非嚴格意義的考古人類學。再者，唯有先瞭解考古人類學與虛構之間的關係為何，虛構的小說才有批判考古／殖民神話怎樣暗藏虛構的契機。1984年，一場在美國舉辦的研討會，以「民族誌文本的寫作」為主題，會後出版的論文集《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成為人類學思想的分水嶺。其中一個議題是，「民族誌的文學性」引起的爭論：文學修辭究竟僅僅為了修飾，抑或，為了更

¹⁸ 黃智慧：〈日本對台灣原住民民族宗教的研究取向：殖民地時期官學並行傳統的形成與糾葛〉，輯錄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頁179。

¹⁹ 德勒茲《地方知識》指出，屬於地方知識的民族誌，經由詮釋、想像、轉譯的文化比較與對話過程，開展更深刻的假設與觀念。董啟章也表示：「不滿足於對某個逝去的時代的質素作其懷舊式的追溯，或是考古式的發掘和對證。……而是一個如何從不同的角度面對、理解、抗衡或企圖轉化現實的文本經驗。……並不在於它是否符合和反映現實，而是在於它如何創造出一個相對於現實的文本想像空間。……發展出一套處理自身現實經驗的個人方法論，在都市亂象中為自己整理出一些方向。」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輯入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頁395。

有效地進行客觀分析。

民族誌文本的作者翻譯他們要表達的意義，不可能避免使用具有表現力的修辭手段。最好的民族誌文本（嚴肅的、真實的虛構）是由一系列經過選擇的真實組成的。而民族誌的真實從來就是不完整的、部分的。因為不存在完全的知識，民族誌學家在田野工作中收集的資料總是有限的。²⁰

論文集裏相似的看法還有，斯蒂芬·泰勒的〈後現代民族誌：從神祕學到神祕的文本〉。後現代民族誌由對話的片段構成，儘管其中有相對之處，甚至，有限度的真實不可避免地帶有遮蔽性與虛構性，但各個片段卻能交織成多音道文本（polyphony text），以歧異補充單聲道，再現部分的現實世界——即王德威指出《地圖集》展示的駁雜地形是權力交鋒與錯置的文本空間。

後現代民族誌是一種對於作為心理治療的美學意識的回歸；後現代民族誌與後現代世界息息相關，它不能太過抽象而遠離生活；它的目的不是增長知識，而是重構經驗；不是了解客觀現實（因為客觀現實已是常識），不是解釋我們如何了解（因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在社會中重建自我，重建日常生活的行為。²¹（底線為筆者所加）

引文再度說明本文何以名為（偽）考古人類學的民族誌視野：董啟章的小說意圖發現有別於殖民／考古／他者化眼光的香港身分與文化想像，以期重構「自我」。況且，小說虛構並非意指虛假，詩性的虛構是再現真實語境或檢視城市心靈的關鍵。

承上，海洋是有趣的切入課題，誠如柏狄（Mary Pratt）表示，十八世紀

²⁰ 徐魯亞：〈後現代主義民族誌的宣言〉，輯入莊孔韶主編：《人類學經典導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549。

²¹ 同前註，頁553。參見（美）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高丙中、吳曉黎、李霞等譯：《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徹爾著，王銘銘、藍達居譯：《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上半葉的歐洲殖民主義是航海型的殖民主義，因而出現許多航海式敘事體的歷險遊記。發展至十八世紀下半葉的轉變是，以研究和掌控自然為目的，企圖建立世界各地的自然科學的知識體系，²² 地理學是其中一環。亦即，地圖是以航海殖民起家的不落日大英帝國，凝視殖民地與世界的一種敘事形式，除卻《地圖集》回應之，〈那看海的日子〉亦然，是董啟章創作生涯中代表性的一篇。後者的意義在於，面向大海，不是為了向外拓展的野心，而是向內深刻、又不失封閉地田調香港本土，這般的敘事姿態乃重新選擇論述視角與路徑。

〈那看海的日子〉以一九九七年「我」與象徵鄉土香港的妻子結婚來開篇，暗示該文意圖回應九七回歸，接續的主要情節倒敘至多年前「我」與妻子相識的場景。當時，「我」剛來到沙頭角，僅攜帶日用品、地圖、星圖、野外求生手冊、動植物圖鑑、地區古蹟資料等。由此可知，該文安排「我」暫居沙頭角小型客家村的性質是本土考察，而非重述官方的宏大論述，但「我」的矛盾是：

我在大學念的是歷史和比較文學，在歷史系用英文念過香港本土歷史，在比較文學系又用英文念過香港文學，所以來做一點關於香港地區的考察也不是無中生有的。哈哈！但我為甚麼要這樣合理化自己的無聊舉動呢？我為甚麼要理會別人對我的觀感呢？我來這裏不正是要逃離別人，忘記別人的存在嗎？²³

最初，「我」認為來此進行的田調是沒有意義的無聊行動，只好找冠冕堂皇的「意義」來說服自我：既然曾以英文研讀香港歷史與文學，考察香港可謂順理成章，顯示「我」很在意「別人對我的觀感」——順從大寫他者（the Other, grand autre）詮釋香港歷史的眼光，甚至以大寫他者為真實而理想的自我。因此，〈那看海的日子〉的創作動機是：「我」必須拋開既定的觀看框架和目的，在看似失序又失義的漫遊中，探勘我城的本土價值與文化主體。

²² 葉蔭聰：〈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輯錄陳清橋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49。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²³ 董啟章：《衣魚簡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頁105。

例如，「我」尋訪上禾坑村中一間百年歷史的私塾「鏡蓉書屋」。

書室的建築佈局與祠堂頗為類似，通常都在正廳中間擺放祖先牌位，學生每日都上堂前敬拜祖先，成為教育的一環。在一些鄉村，村民用宗祠兼作書室。曾用作書室的萬石堂建於乾隆十六年（1751），是上水廖族的宗祠，在 1985 年曾重修，是本港保存的最好和最具規模的客家宗祠。²⁴

引文說明書屋與港人祠堂宗族的密切關係，而「我」探訪鏡蓉書屋則體現了尋根香港的預兆與契機。果然此時，「我」邂逅一位名為練仙的女孩，她極其熟稔地方風土民俗，如天后娘娘、哼哈二將（千里眼和順風耳）、婚禮禮儀、禳災祈福的太平清醮等。她格外著迷的是，在太平清醮中舉行的神功戲。依據蔡志祥的研究可知，展示特定主題與集體經驗的節日，無論神聖或世俗，皆具有公眾性的社會意義與文化價值。例如，舉辦太平清醮，本是以長洲島的惠潮府為主，屬於族群節日。行至 80 年代中期以降，由於香港訴求的本土認同帶動本地旅遊熱潮，傳統節慶遂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復以旅遊發展局為吸引遊客，將太平清醮定期於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八，使本以族群為中心的節日，推演成屬於全港的節日。²⁵ 尤其，太平清醮是一場香港精神新生與文化再現的象徵儀式，²⁶〈那看海的日子〉與之呼應的關鍵場景是：

練仙卻不想看後面那身場面了。她不想看角色後面的真人，都會談笑，都會和戲迷握手，都會作態拍照，都會講日常的說話。她希望記憶中只有那些人物，她心目中的神。這些，我好像都完全知道了。所以我理解她為何在回程的船上不說話，坐在船頭，低頭望著黑色的海。漆黑的海寂靜如鬼域。我覺得，我們要說的話，也已經說過了。雖然我們事實上

²⁴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 年），頁 254。

²⁵ 蔡志祥：〈節日、民間宗教和香港的地方社會〉，輯入李光雄等編：《歷史與文化：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文集》（香港：香港公共圖書公司，2005 年），頁 68-87。

²⁶ 「醮是為了一個特定社區、特定群體在特定時間舉行的大型社區性的宗教節日。它的目的是保護這個社區，令這個社區從危險的『陰』的處境重新回到『陽』的境界。……醮蘊涵了社區人群的宇宙再生的世界觀。」同註 25，頁 88。

甚麼也沒有說過。²⁷

神功戲是練仙「心目中的神」或「記憶中的人物」，但她不喜歡表演結束後，群眾在後臺與演員說笑。由於她認為神功戲代表的地方風俗與民間文化之於鄉土香港異常地重要與真實，不該被眾人視為不過是場戲，是假的，這使她陷入沉默的黑色之中。不僅如此，她堅信天后娘娘與千里眼順風耳，是「修練成仙，專拯救海上遇難的漁民，所以才被封為『護國庇民天后元君』！」²⁸ 因此，練仙在「回程引渡／象徵儀式」的船中，以靜默的姿態凝望寂靜的海，有別於殖民航海不斷向外拓展的野心，改而向內關懷香港本土，又賦予海洋以中國民間信仰的內涵，而非以漂洋傳教而來的聖母為唯一信奉。此乃「我」透過練仙與在地生活所獲的考古田調，顯然有別於在殖民地英式教育中所學。

然而，以上是練仙的生命關懷，觀察者「我」如何切身體悟向內轉的途徑？轉折在於，練仙帶領「我」在雜草叢生的古道，探尋七、八十年前從九龍北上到大陸的鐵軌遺址，²⁹ 行進的過程中，寸步維艱，象徵考掘香港歷史的艱難。

我看著她白熟的背影，想起第一次和她說話，她帶我到鏡蓉書屋去的情形，也是這樣子，有一種似無軀體的白。我和她時遠時近，彷彿走一輩子，也是這樣。我知道，在那白晃晃的光亮下，隱藏了黑色的秘密，我們曾經在沉默中分享過它，但現在它只透現出香汗的形狀，像一幅無法讀懂的地圖。我在尋找這地圖的入口，或出口。³⁰

引文再三形容的白，卻隱藏著上段提及的黑色海洋，暗示在黑色不明所代表的各種他者化論述中，鄉土／本土香港的特質難以辨識。尋找白色地圖出入口的動機，意味著究竟該如何照亮鄉土／本土香港的能見度？終於，「我」在回返城市的前夕體悟出來：將鄉土／本土香港象徵性地放置在下文提及的「水潭中央／世界中心」，而非航海殖民者的他者邊陲。

²⁷ 董啟章：《衣魚簡史》，頁 139。

²⁸ 同前註，頁 108。

²⁹ 同前註，頁 129。

³⁰ 同前註，頁 141。



潭隨著水波不斷擴大，變成了那個海，那個我看了一整個夏天的海，那個我們共同渡過的黑海。我有點害怕了。我怕她溺死了，也怕根本就沒有她，怕世界上只剩下我一個。我也跳進潭裏，向中央游去。……（水）很清很清。突然，那黑色的海消散了，海水變成透明綠。我可以看見她了……³¹

跳進水潭後，水潭竟擴展成一汪夏天的海，顯示唯有主動介入與正視各種他者化論述，辨析其中的虛構性所壓抑的歧異與多義，才能釐清香港的主體視野，一反前文描述最初的「我」透過英文文獻，才能間接理解香港。

由此可知，〈那看海的日子〉向黃春明〈看海的日子〉與臺灣鄉土文學致敬，後者描述鄉土人物白梅從備受歧視的妓女轉變成回歸土地與獲得救贖的母親，從而揭開一段被壓抑的鄉土小歷史。同樣地，〈那看海的日子〉以「我」在沙頭角的海邊，受到喜愛香港民俗與臺灣鄉土文學的練仙所啟發，關切香港被他者化的手段，以及被遮蔽、被歧視的實際本質，進而尋找自我與鄉土的小歷史。「我永遠也記得，那年夏天，我們在那個假的鄉土相遇，但我們卻找到了真實的東西。」³² 香港文學以城市書寫為主流，未有嚴格意義的鄉土文學，但鄉土化或家鄉化的香港城乃董啟章念茲在茲的創作關懷。於是，〈那看海的日子〉以文學虛構的「鄉土」彰顯其對「本土」香港的關懷，從而質問長期被殖民神話視為落後的、如戲劇般虛假的香港民間文化真得虛假嗎？

有別於港人在航海型的殖民神話中處於被宰制與被論述的位階，〈那看海的日子〉改而主動貼近海（檢視香港的象徵姿態）。尤其，「我」與練仙的互動——「我」帶著這個夏天的體悟回返城市，幾年後，又因鄉土文學而與練仙在城市重逢，隱喻海（檢視香港的象徵姿態）須與鄉土、城市相互連結與對話。亦即，以海延展城市空間裏本土身分的底蘊，使向內厚實的本土視野不封閉，甚至帶有世界的格局，包含中國沿海的民間信仰、臺灣鄉土文學、英殖民經驗

³¹ 同前註，頁 146。

³² 同前註，頁 147。



等資源。此乃使鄉土體現出可辯證的游移性，而非固著、限定又封閉。此後，海再三出現在董啟章的小說中，說明〈那看海的日子〉於其創作旅程中的標誌意義。畢竟，空間是殖民論述與後殖民論述共同使用的表述話語，而空間又是建構身分想像的中介。

綜上，上方引文中，「貼合」練仙皮膚所呈現的地圖，猶如「皮膚浸泡的海水」。這一改海洋拓張中權力版圖劃限或隔閡香港為從屬殖民地，而是變更成：身處世界脈動之中，對香港仍不失燙髮情感與扎根土地的地方感。其途徑是洞悉虛構化與他者化手段，進而視地圖為可重新詮釋與考古的開放性文本／民族誌。循此，城市具備土地／地方感的內涵，也納入海的象徵視野（檢視香港的積極姿態與世界格局），才能推翻殖民神話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框定鄉土自然為原始落後，迥異於城市的文明進步。

（二）觀看的視角與名字的寓意

上段所論的二元對立將於第三點詳論，我們先說明殖民者視土地為版圖的方式是繪製與命名地圖。在官方修訂的地方志或歷史文獻中，對地方人群的命名或分類，不止於表達官方認知，而是以蘊含意識形態的故事來闡釋城市的歷史由來與內涵，以期達到教化民眾的目的。

在不同的時間裏，同一地方可能具有不同的名字。這樣命名的目的是「把土地轉換成地圖，……這個地圖在確切意義上告訴一個村子的居民維持他們生存所需要的信息」。……在一個給定的時空框架中，個性化的力量同命名力量聯繫在一起；命名則是一種凌駕人和物之上的力量形式。³³

薩伊德《東方主義》或《文化與帝國主義》同樣表明，殖民者藉由命名來瓦解、塑造、操縱殖民地人民的身分想像，使之符應殖民者的眼光與政治體系。有鑑

³³（美）戴維·哈維著（Harvey, D.），胡大平譯：《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301。

於此，《地圖集》以相當的篇幅檢視地名掌故，以期與合法化英殖民權力的論述策略開啟對話。

考證香港地名，始終是殖民地人民辨析歷史源流與正名香港的途徑。例如，葉靈鳳於 1963 年《新晚報》發表〈讀《新安縣志》札記〉，追溯香港歷史源自六朝寶安，唐初更名為東莞，明萬曆元年在東莞增設新安縣。³⁴ 由此可知，香港歷史並非殖民神話所強調的，始於 1842 年。無獨有偶，《簡明香港文學史》第一章「古代香港」首先考察香港地名與歷史源流早於明代之前，³⁵ 書寫意圖無疑與葉靈鳳相同。誠如王宏志表示：

葉靈鳳並無意拆解香港與其母體之間的關係，他很早便為九七前後的大陸香港史家指出了路徑：從香港的古蹟古物中證明香港先民的文化，跟中國沿海一帶的是「源出一轍」的。³⁶

歷史論述的路徑改成香港與中國沿海的淵源，而非以歐洲航海探險替香港史揭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歐洲航海殖民史是香港海洋史的一環，董啟章《地圖集》、《繁勝錄》等 V 城系列皆以之為主題。

不唯史書考證地名，《地圖集》也考察香港城裏的其他地名，如「四環九約」的命名掌故。「四環」的內涵包括：內向的立足重心、地區間相互勾連的環扣關係、既依存又互為枷鎖，至於「九約」的意涵則有契約、大約、失約之地。上述的地名含義彼此悖反，暗示香港的夾縫處境，是因契約與失約而處於中國和殖民者之間。誠如《繁勝錄》所言，這是雙重的約束、重整又解構。³⁷ 循此衍生的問題，我們以太平山為例：太平山此一地名在地圖上消失，

³⁴ 姜德明主編，小思選編：《葉靈鳳書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頁 26。

³⁵ 「九龍的地名最早見於明朝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應檳所著邊疆軍事志書《蒼梧總督軍門志》。……但這不等於說，香港的歷史只可追溯到明代。」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香港：三聯書店，2009 年），頁 4。

³⁶ 王宏志：〈葉靈鳳的香港故事〉，輯入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頁 61。

³⁷ 董啟章：《繁勝錄》，頁 29。

太平山一帶僅存卜公花園和東華醫院，³⁸此乃批判人們忘卻地名，又安於太平假象，以致逐漸遺忘歷史。簡言之，《地圖集》考證地名的源流與意涵，不但是為了挖掘新議題，賦予考古學以新視野，翻轉殖民地被看與被詮釋的位階，更企圖譴責人民荒誕地呈現歷史失憶——漠然於華東醫院與英殖民者的對峙、協商與雙重逼仄。本文檢索史料得知，華東醫院是十九世紀香港最大規模的華人組織，與華人精英份子有密切的關係。王韜甚至將教化香港風氣之功歸於華東醫院：「香港渺然一島耳，僻在炎陬，素非孔道，而一旦為善之效，可睹如此，是則在人而已。」³⁹為善的層面舉凡贈醫施藥、舉辦義學、接管義祠、施棺殯葬等，無不攸關重要的社會問題，此外還擔當華人与港英政府的溝通橋樑。⁴⁰當然，《地圖集》與〈永盛街興衰史〉皆指責華東醫院也是危害不淺的鴉片煙商，顯示歷史包含正反的複雜性，無法簡單地以二元對立論述任何歷史人事物的影響力。既然華東醫院之於香港歷史的在地意義與文化價值何等弔詭又重大，卻於《地圖集》敘述的官方記憶中，無法以地圖召喚出太平山上曾發生過的各色故事，從而揭穿殖民神話及其集體記憶的二元選擇性與遮蔽性。或者說，困惑於「我是誰」的港人，陷於日常生活的勞碌瑣務之中，遂安於習焉不察的名字，不再或無從理解香港故事被他者化的癥結。這無異於自我放棄：批判性地檢視中英雜揉而成的記憶，致使無所憑依，失根又失家。

既然城市地名攸關處於其中的人們如何自我命名，我們再以董啟章發表的第一篇小說〈西西利亞〉為例。該文由四個人物視角，引領出四種終結版本：西西利亞本是流行服飾店中展示服裝的木質模特兒，然而，也可能是會計員、售貨員或安琪利亞。如此的懸疑，使西西利亞此一命名具有多義性和不確定性，從而質問「我是誰」，一如文中不斷變化的第一人稱視角。尤其，這四位小說人物雖各有不同的職業，卻同樣無法擺脫城市常軌中一再重複的日常生

³⁸ 董啟章：《地圖集》，頁104。

³⁹ 王韜：〈創建華東醫院序〉，輯入香港東華三院董事局編：《香港華東三院百年史略》（下冊）（香港：香港東華三院，1970年），頁140。

⁴⁰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169-171。

活，正如同西西弗斯日日推石的無限迴圈與桎梏。

亦即，對自我命名的不確定性，意指人們捲入城市的日常模式，關注當前此刻，安於常態的主流論述，以致迷失在樣板化的物質生活中，徒然地感嘆經濟蕭條，⁴¹ 卻無視主流論述的歷史癥結——英殖民者藉由標榜商業發展所操作的殖民神話。畢竟，自我的故事尚且不清楚，遑論批判大寫他者名為香港的故事。這般對自我感到困惑不已的城市人，皆為西西利亞／佛斯的化身，徒勞又失神。

就只是那一念的戀惜，便給物質榮華誤了。……我已經記不起這個故事的出處，也不知是誰告訴我的，不知原來是否這樣，也不知道洛特的名字是否洛特，甚至不知是否有這一個故事。但怎會沒有呢？故事又怎會是不曾存在的呢？只要你說，故事便存在。但故事又何曾存在過呢？而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會想起這樣的一個故事，會想告訴西西利亞一個這樣的故事。西西利亞，你也許會感到莫名其妙了。⁴²

各色故事存在於歷史長流之中，但關鍵在於，如何挖掘與怎樣述說被多數人遺忘的故事。倘若西西利亞此一第一人稱的名字與「我／城」形成換喻關係，則可視西西利亞為香港城。當「我」不帶目的地述說香港故事，這對於長期被各種權威話語操作的西西利亞／城，顯得莫名奇妙。或者說，自主地書寫或講述「故事」，之於恪守常軌而麻木的城市西西利亞而言，竟淪為西西弗斯式的無謂行為。換言之，當西西利亞隱喻城市時，該文不再複寫殖民者將城市掛鉤到地圖命名／權力版圖之上，而是將「城市命名／書寫／發言權」界定在說故事的主動性，循此，「西西利亞就像一具未鑿成的雕像，懷著多方面的潛質和無邊的可塑性。」⁴³ 此乃〈西西利亞〉故事新編希臘神話：比馬龍（Pygmalion）在製作葛拉蒂雅（Galatea）雕塑的過程中，情愫油然而萌生，遂

⁴¹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頁24。

⁴² 同前註，頁19。

⁴³ 同前註，頁17。



祈求神將雕像變成真正的少女，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教育心理學稱之為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⁴⁴ 即自我期許與應驗。一如〈西西利亞〉作為董啟章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揭示其創作旅程的期許：以文學的無限性呈現城市的多元性。

要而言之，〈西西利亞〉故事新編的意義有二。其一，譴責城市人失神，其二，啟示人們「新編」神話／故事的操作性，再新釋何謂故事，以期隱微地鬆動殖民神話的操作內涵其實狹隘又侷限。故事的新解：「故事何嘗不是我們凝聚社會想像、演義文明活動的重要依據？……為香港說各式各樣的故事，是『說出』香港存在、延續意義的重要手段。」⁴⁵ 尤其：

香港的故事？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甚麼位置說話。⁴⁶

董啟章的中短篇小說經常以人物、街道、建築或音樂來隱喻香港歷史，而這篇西西利亞漠視故事的小說，無疑是部分港人忽略香港歷史的寫照。與其說漠視歷史故事的內容，毋寧謂不思考「故事」其實寓託的是：觀看香港歷史的新視角與新位置。職是，以一則則的故事取回主動的話語權，活絡香港文學與史觀，從而擺脫被權威凝視與支配的他者內涵。

再以〈看（不）見的城市〉為例。該文書寫好運茶樓的時間步調，有別於不斷變化的城市風景，而是透顯出緩慢凝結的時代氛圍：「一個老朽而頑固的年代。……我的照片只能記載矛盾和模糊，但不能幫助我去理解和反映一個漸漸湮沒的生活環境。」⁴⁷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揭示照片中的刺點（punctum），能激發混沌不明的內心感知，但「我」的照片中，刺點已蕩然

⁴⁴ Robert Rosenthal, & Lenore Jacobson, *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 Irvington, 1992).

⁴⁵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輯入《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40。

⁴⁶ 也斯：《香港文化》，頁 4。

⁴⁷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頁 110。



無存，間接質疑以照片再現歷史現場的可能性。或者說，關鍵不在於以圖像或文字再現歷史面貌，而是以什麼視角來觀看歷史。其原因在於：「拍了幾張，才發覺城市事實上並沒有很多值得捕捉的景象。……我們開始理解到所謂決定性的一剎那可以只是一種刻意的營造。」⁴⁸ 引文提問：如何可能定格瞬息變化的城市時間，作為歷史證據？因此，應關注不同視角的時間感知，而非以唯一又獨斷的抒情主體霸佔記憶發言權，才不會淪為了無新意的重複觀點。由於無論選擇哪一個剎那的時間場景，皆可能暗藏立場或操作。例如，筆者概觀香港歷史的書寫型態得知，除卻以文字或地圖再現香港記憶之外，也經常以照片敘述香港歷史的變遷。撰寫者很可能依據主流論述，簡單化地判讀或命名照片，使照片敘事淪為陳腔濫調的香港歷史，甚至遮蔽或漠視某些照片是出於藝術審美的拍攝動機。

〈看（不）見的城市〉的應對之道是：

因為她映照出這個世界的過去。青春變成了一種過失。與外面的世界不同的，是這個世界並不接納記憶的工具。它執著的是一種原始的記憶，一種身體的紀錄，但它也害怕自己的過去，任由歷史隨著可朽壞的生命磨滅淨盡。⁴⁹

她的青春反襯出的「這個世界」，是好運茶樓投映的城市歷史場景。於遲滯不變的茶樓中飲食的人們，無法接受相機代表的現代化記憶形式。職是，引文中原始的記憶和身體的紀錄，暗指肉眼的觀看之道，無奈身體記憶因時間的流逝或權力眼光的滲透，竟無法確證記憶的原始性，一如「我」一再思考文字或影像之於記憶的可信度。因此，歷史場景不在於茶樓本身，而是凝視茶樓的目光，由於敘述香港歷史的艱難在於，如何擺脫刻板的文化視角，又怎樣透視歷史記憶背後複雜的權力關係。亦即，這般原始性的裸視，不輕易戴上任何有色眼鏡，也不輕易套用任何記憶工具，故生發出一股顛覆力量。於是，最終，「我走出

⁴⁸ 同前註，頁 119。

⁴⁹ 同前註，頁 123。



好運茶樓，跑到附近的地鐵站，打了一個電話給她。我發覺我很想見她，想看看她的眼睛。」⁵⁰

這股想見「眼睛」的動力，顯示關鍵不在於敘述什麼歷史，而是如何敘述歷史——在習焉不察的集體記憶中，藉由重新命名（觀看）來說故事。一如〈看（不）見的城市〉的篇名，重釋卡爾維諾的書名：城市的看見掩蓋許多看不見之處，於此角力中，看不見的通常被視為原始劣等，看則是主動支配，但該文試圖翻轉之，讓看不見的被看見。此乃間接題解《地圖集》的副標題「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開啟不同於殖民論述的城市想像與自我建構之道是，不同的視角，若再輔以〈看（不）見的城市〉強調肉身的原始感知／視角，反而能貼近城市的真實性。由此可知董啟章小說隱微地反撥：挾持考古學成果的殖民神話以有色濾鏡／凝視，譴責香港人種的民智未開化、未啟蒙、原始又不文明。

綜上，無論以地圖或命名來捍衛權力，無非是為了建立順應英國利益的香港秩序與文明。例如，《地圖集》「街道篇」中〈愛秩序街〉一節說明街名由來。

在愛秩序的想像中，香港島將會以這座屹立不倒的巨型軍事要塞為中心和象徵。但當時的總督砵甸乍堅決反對愛秩序的建議，極力保留中區作商業用途。愛秩序少校的軍事城夢想始終未得實現。……可能由於早期本地村民飽受海盜的侵擾，而愛秩序少校派駐重兵布防的喜好維護了區內的安全，於是有村民便把他視為祈求平安的對象。後代輾轉相傳，愛秩序便蒙上了神祕的色彩。後有人於海灣旁建一愛秩序廟，供奉一威儀媲美關帝的愛秩序公，……在一九九七年的香港街道圖上，愛秩序灣已經因填海工程而消失，愛秩序廟及愛秩序村亦不復存在。⁵¹

固然商業利益是殖民者經營殖民地的首要圭臬，但愛秩序少校、總督、村民彼此之間陰錯陽差或會錯意，使愛秩序街自成一套秩序。問題是，究竟宗教、軍

⁵⁰ 同前註，頁 123。

⁵¹ 董啟章：《地圖集》，頁 128-129。



事、商業、漁民生計哪一套秩序才是中心，其實頗為模糊，由於秩序之於不同立場者有不同的想像。誠如〈名字的玫瑰〉指出：「秩序基本上不是工具性的（服從於名字的權能），也不是壓制性的（是名字的權能的體現），而是開放的、自我衍生以致無限的。在名字與名字之間，只有秩序的幻象。」⁵²

既然秩序產生於命名背後的權威體系，作家透過重新命名——另擇觀史的視角，突破秩序的邊界與網羅，才有延異與檢討的空間。首先，這是拆解殖民神話及其統治秩序的契機，更彰顯香港小說的使命與價值：針對殖民史進行論辯是不可迴避的議題，其後，另闢蹊徑地重構歷史或虛構故事也於焉可能。再者，誠如《地圖集》所言，現今不會再有航海時代因發現處女地所生的狂喜，改以讀圖為一種新的航海術，以期重新尋找桃花源（自足自主的秩序）的入口，而入口正是名字。⁵³ 亦即，另擇史觀與虛構故事的目的是，既然權威秩序失於虛假，又該如何重建自我秩序呢？董啟章的小說經常以自然又原始的山林應對之。

（三）物種自然與文明進化的角力：

歷史起源、非常的自然空間與本土的城市空間

十九世紀以降，英殖民者冠冕堂皇地以教化殖民地的原始物種為名義，強化種族差異，掩飾殖民欲望。尤其，殖民神話凸顯的施政功績之一是，使原始的香港躍進成以資本商業為主的進步城市，此乃暗藏城市啟蒙與原始自然的二元對立。有鑑於此，董啟章的小說經常描繪處於現代城市中的迷惘港人，需回返山林自然，重審商業和城市所致的精神困頓，山林自然於是象徵一方省思城市文明和歷史記憶的非常空間。⁵⁴ 尤其，賦予自然物種以重要的精神價值，挑

⁵²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頁 37。

⁵³ 董啟章：《地圖集》，頁 36-37。

⁵⁴ 常與非常的觀念，可參見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6 年）。



戰殖民神話中文明進化優越於原始自然的簡化邏輯，但這並非化約城市與自然為罪惡與救贖，畢竟，港人的歷史記憶無法迴避英國殖民的影響。

梅家玲由女性主義中雌雄同體和女同志的理論，分析〈安卓珍妮——一個不存在的物種進化史〉（以下簡稱〈安卓珍妮〉）的性別意識，旨在揭示父權社會構築性別話語之餘，又輔以生物學理論，作為發聲依據。小說對此質疑的契機是，「我」離開城市、到山林中尋找的安卓珍妮，是一種放棄進化的物種，梅家玲以道家思想指出該尋覓歷程乃一場圓形回歸，進而批判人由科學實證或進化論述來建構的存在秩序，看似合理，實則是與道體割裂的語言操演。⁵⁵由於「男／西／殖民／進步」、「女／東／被殖民／原始」的二元對立，是後殖民論述意圖打破的疆界。其中，本文認為進步與原始的時間思辨是董啟章小說的一大課題。有鑑於前文論及香港史書由香港地名的歷史沿革，說明港史並非源自英殖民，這除了以「名字」隱喻如何擇定論史的路徑與眼光之外，更揭示歷史起源乃至關重要。因此，下文聚焦在原始自然與物種進化的辯證，既能投映〈安卓珍妮〉思索性別意識與殖民神話的幽微關係，也能進一步思考歷史起源究竟根植在物種自然或文明進化，亦即，究竟是什麼形式或內涵的時間／起源觀。

「我」尋找斑尾毛蜥的山區是丈夫老家的所在：

我丈夫的家族與自然界的勾連，自他祖父以後便斷絕了，老家中的無數大小盆栽已經盡數凋零。但這並沒有對這個家造成任何影響；離開了泥土，家族在城市裏開枝散葉，反而愈加燦爛蓬勃起來。……門前的宮粉羊蹄甲……他要認識真正屬於這片土地的東西，一些生於斯長於斯的生命，而非從他處移植過來的產物。他自己便是一株外來的品種，在戰亂的時世帶著兒子和微薄的資本從大陸來到這個以洋人名稱命名花朵的地方，在陌生的土壤扎下他的根來，……洋紫荊的深紫色花朵比宮粉羊蹄甲更璀璨嬌豔。⁵⁶

⁵⁵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頁267-299。

⁵⁶ 董啟章：《安卓珍妮》（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0年），頁14、33-34。

如果說殖民神話企圖教化原始野蠻的香港移民，那麼，祖父身為丈夫家族中的第一代移民，不免仍與自然有切身的象徵關係，故他稱自身宛如外來品種在陌生的土壤上扎根，熱衷研究本土植物。這有別於殖民者塗消本土色彩，著重在移植與嫁接官方意識形態。例如，1880年前後，巴黎神父於薄扶林鋼線灣首度發現洋紫荊，1908年林務部總監鄧恩判定洋紫荊為新物種，於英國《植物學報》上發表，總督亨利·卜力則命名為洋紫荊。⁵⁷然而，事實是，洋紫荊是本土植物宮粉羊蹄與紅花羊蹄的混種，但殖民者卻以洋紫荊的「洋」，使人誤以為是外來的移植品種，或者說，以洋此一命名更新物種的發現者與擁有者，此乃殖民論述意圖更新／置換香港的種族與身分。簡言之，殖民者將本土植物渡上一層洋包裝，移民者如祖父則努力認識與生根本土關懷，兩者交織而成的張力，使香港性應凸顯的不是「洋」紫荊，而是洋紫荊的「混種」顏色較諸純種的本土宮粉更顯嬌艷。

追本溯源，植物研究的歷史意義在於，十八至十九世紀進行海洋探險與殖民拓展的歐洲國家，無不大規模地蒐集植物標本，探究如何開發殖民地的經濟和藥用資源。例如，英國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成立於十九世紀，採集殖民地的奇珍物種，奠定植物學的分類基礎。這可由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管窺豐富的史料，顯示殖民考古是香港文學中不可漠視的課題，董啟章的小說並非個案。《寂寞雲園》引用喬治·班遜姆《香港植物誌》：「香港所產的植物，可以北至西伯利亞南部，南至非洲南美洲都可找到它們的族類。至於近處的印度、南洋、日本的植物與香港關係的密切，自不待言。」⁵⁸此乃小結黃得雲的情夫西恩以植物資源在馬來西亞與香港擴張家族事業的版圖與利益，可見兩人是殖民地與殖民者的寓託關係。一如引文中香港植物匯聚的地理範疇，暗示殖民帝國在世界版圖中拓展的雄心壯志，而香港是英國想像東方的聚焦地。

⁵⁷ 詹志勇：《細說洋紫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

⁵⁸ 施叔青：《寂寞雲園》（臺北：洪範書店，1997年），頁22。黃蝶娘交往的匯豐銀行的英國經理奈德，計畫完成一部東南亞自然植物史，曾祖母黃得雲的情人西恩也曾任職匯豐銀行。

至於《遍地洋紫荊》引用葉靈鳳於 1947 年《港島日報·香港史地》發表的〈西文香港史地書錄題解〉，⁵⁹ 該文介紹十七部有關香港史地的代表書籍，其中一部正是《香港植物誌》。⁶⁰ 葉靈鳳標誌港人重釋香港史地的契機，題解西文史料乃試圖轉易被詮釋的位階，一如〈安卓珍尼〉中祖父生根本土的主動姿態。

然而，祖父的孫輩，土生土長在香港，受教於殖民神話所揭示的文明啟蒙，無須像祖父經歷從移民到本土身分的認同轉換，卻未能省思以洋紫荊為市花的香港文明如何建構而來，界定物種的內涵是否真切，殖民歷史從何而起與是否合理。因此，「我」遠離自認為文明理性的丈夫所在的城市，於過渡時空的山區，回歸原始的自然與土地，藉由尋找物種安卓珍尼，展開一場求索自我心靈的冒險。「我們被捕獵，被困在房子內，……我們的後代也許可以進化出新的條件，突破環境的限制，……在安卓珍尼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命運。」⁶¹ 安卓珍尼未存有照片影像或文獻記載，僅存於口耳相傳之間，全文以此寓託妾身未明的「香港源起」。這質疑：捕獵／圍困香港的英殖民神話，乃標榜商業文明啟蒙了原始的香港人種得以進化與發展，從而說明殖民是港史的源頭，也定調香港時間為線性進程。⁶² 對此，〈安卓珍尼〉透過對比「正式文獻」與「口耳相傳」，⁶³ 挑戰「正式」記錄與「非常」傳言的定義邊界。就在模糊官方與民間之際，揭示小說述事與殖民神話相互論辯的核心命題：香港的歷史源起與

⁵⁹ 美國人班遜姆所著的《香港植物誌》，於公元 1861 年出版，收集了 1056 種香港本土的花木名目，按種類分別編目，洋紫荊樹並不在其列。」施叔青：《遍山洋紫荊》（臺北：洪範書店，1997 年），頁 93。

⁶⁰ 原名 *Lora Hong Kong Ensis*，1861 年於倫敦出版。姜德明主編，小思選編：《葉靈鳳書話》，頁 19。

⁶¹ 董啟章：《安卓珍尼》，頁 66。

⁶² 「1841 年 4 月，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Lord Palmerston）曾經稱香港島為『幾乎沒有人煙的荒島』（a barren island with hardly a house up on it）。當代英國學者安德葛（G.B. Endacott）說：『香港歷史的實際開端是在 1841 年英國人到來的時候』。但是，近年的考古發掘和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說明，這些看法並不正確。」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頁 4。

⁶³ 董啟章：《安卓珍尼》，頁 18。

文明進化之關係。全文以相當篇幅的生物考察，推演斑尾毛蜥的演化，竟與哺乳類之一的人類源於同一祖先——地質紀二疊紀和三疊紀的母幹爬蟲。有趣的是，斑尾毛蜥在許多哺乳類動物絕種後，之所以能於進化競賽中生存下來，乃弔詭地緣於牠放棄進化的器官，甚至陷入不曾記憶的無時間狀態⁶⁴——否定線性進化的時間進程，卻安然地在歷史長河中繁衍。換言之，就全文的副標題而論，「一個不存在的物種進化」，究竟意指安卓珍尼是不存在的物種？或者，在進化史中不進化的生物被當作不存在？若此，歷史起源一定要和文明進化劃上等號？抑或，進化的方式違反線性時間就被視為不存在？什麼定義或內涵謂為進化的標準？若訂出唯一的進化標準，還稱得上文明嗎？這隱微地質疑香港史源自殖民者霸權標榜物種進化的十九世紀。

然而，這並非以建構與解構的二元對立來處理殖民神話，而是正視殖民為香港歷史的一環，畢竟，香港不可迴避英國色彩和殖民論述的影響力，港人的心理糾葛於焉形成。此乃〈安卓珍尼〉關注的議題。例如，「我」渴望擺脫代表城市文明的丈夫，但當彷彿原始人的山中男人引領「我」，感受深山「潛伏著各種生命，隱藏著各種危險」時，「我」又質疑：「而在這另一個世界裏，我肯定我便能夠得到解放嗎？還是，那裏有著另一種暴力，另一種壓抑？」⁶⁵事實上，原始山區之所以潛藏著暴力的癥結是，「我」自恃城市文明的優越位階，遂鄙夷山中男人不夠文明的原始性，且惟恐他以野蠻暴力來侵犯「我」，因而滔滔不絕又似是而非地談論政治主權民主，以捍衛身為城市文明人的自尊心，但這已違背入山的初衷。甚至，面對大音希聲的自然界，「我」憑恃的城市文明備顯貧乏又單向。⁶⁶此乃文明與原始引發的心理矛盾：城市文明真得文明？抑或暗藏貶抑自然的暴力？其中的癥結是，「我」原本的世界觀已相當模糊，添上自然此項課題後，更是失義，只好沉浸到深山水潭裏：

⁶⁴ 同前註，頁 40。

⁶⁵ 同前註，頁 42、67。

⁶⁶ 同前註，頁 46-47。



我在這兩個世界間穿插進出，慢慢地把混雜的感官洗濯乾淨；我開始沒有惱、沒有恨、沒有妒忌，也沒有快樂、沒有幸福，只有現在一刻的純粹存在。⁶⁷

藉由水潭的淨化，在瞬間的此刻存有中，精神新生，象徵純粹的起源，純粹地不受到任何意識形態的暴力支配，遂不再唯城市文明而恃，甚至體悟文明和自然並非涇渭之別。⁶⁸悖謬地，當「現在一刻」牽涉到起源，就不只是此刻而已，而是派生出對歷史長流的省視。歷史起源是英殖民神話自我合法化的重要議題，但「我」遊走在自然與文明之間，看法將有別於二元對立區判自然與文明的大寫他者。即或如此，「我」關注歷史起源，何嘗不是殖民經驗難以割捨所使然。由此可知，〈安卓珍妮〉進一步指出〈那看海的日子〉所謂港人應正視的他者化論述，其中一項議題是歷史起源，我們沒有忘記〈那看海的日子〉也以練仙跳到水潭洗滌作結。

綜論本部分的三小項可知，董啟章小說以自然為媒介，視城市為土地，一改版圖的權威凝視，才有反省歷史論述如何定調起源的可能。當九七回歸令董啟章的小說以偽考古人類學——生物考古或自然田調——考察歷史時，有鑒於殖民者期許殖民地以物種進化想像時間及其起源，於是，小說不僅僅關注「回歸中國版圖」的領屬權，更以「圓形時間的回溯」方式重釋歷史起源，即使內涵不同於殖民者，但與之論辯，以及殖民者重視起源的啟發，皆已成為回歸中國史中不可忽略的環節，也使回溯的圓形時間不是中國道家思想所能簡單涵蓋，而是體現世界性的神話思維。⁶⁹此乃能動自主的世界觀，有別於大寫他者

⁶⁷ 同前註，《安卓珍妮》，頁 54。

⁶⁸ 「城市的世界就在這些山巒後面不出五、六公里的地方，可謂近在咫尺，……我自身彷彿成了這一切的混合體，非因自己而存在，而因山林而存在。……究竟是山野的我在想像著那不曾存在的城市生活，還是城市的我在想像著那從未經過的山野傳奇？」同前註，頁 60。

⁶⁹ 依利亞德提出，在世俗化的現代生活裏，人們在儀式中既以象徵性的死亡結束世俗時間，又象徵性地重複宇宙創生，體驗永恆的精神新生和神聖時空。象徵性的死亡與再生，形成「回歸」式的圓形時間結構，是世界性的神話思維（原型）。王孝廉

凝視中的世界觀。換言之，董啟章將小說名為未來的考古學，⁷⁰顯示考掘殖民歷史是未來不能忽略的課題，但本文以「偽」考古學為名／視角，旨在解構他者化論述，呈現時間的歧異性——凸顯董所謂的未來考古學所關注的議題涉及繁複的時間脈絡。畢竟，過去的殖民經驗在現在每一時每一刻不斷地介入，甚至未來仍餘波盪漾，這不是以單線時間取代或回歸所能一言以蔽之，而是線性進化、回歸中國、回溯起源彼此纏繞又抗辯的複雜時間性。

三、新編的撈泥造陸與洪水神話

神話思維中的圓形回歸，是為了完成內在英雄歸家（找尋起源）的神話歷險，以期安身立命與精神新生，這在〈那看海的日子〉、〈安卓珍妮〉中顯得頗為迫切。⁷¹循此，下文探究〈永盛街興衰史〉、〈衣魚簡史〉、〈名字的玫瑰〉等不只停留於批判「標榜填海造陸和商業發展的殖民神話」，而是故事新編撈泥造陸的洪水神話，以期在回歸與回家的時空辯證中，揭示想像香港史的特質——深化第二部分所論的起源、虛構、名字等蘊含的史觀。此乃本文不同於前人研究之所在。

故事新編是香港小說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道風景，包括劉以鬯、崑南、也斯、西西、李碧華等。其中，劉以鬯之所以創作不少故事新編的佳作，乃因其

認為回歸的神話結構是：神話樂園（原始的宇宙秩序）→樂園破壞（宇宙洪水等歷劫過程，即失樂園）→樂園重建（恢復宇宙原初秩序，完成原型回歸）。王孝廉：《神話與小說》（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年），頁91-98。（羅）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楊素娥譯，胡國楨校：《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1年），頁242-243。

⁷⁰ 董啟章：《繁勝錄》，頁7。

⁷¹ 《千面英雄》將英雄人物的各式經歷歸結出「離家→歷練→返家」的歷險旅程，象徵心理調適的儀式過程。回歸是英雄歷險的最終關口，回歸家園則是歷險過程中重要的精神寄託。（美）喬瑟夫·坎伯（Campbell, Joseph），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立緒文化出版社，1997年），頁4、58、103-106。

顧及香港通俗文學的閱讀市場，但又以看似通俗的故事新編批判港人過於低俗的閱讀趣味，隱微地嘲諷物欲橫流與人性扭曲的香港商業性。尤其，揉合西方意識流等現代派技法到中國經典故事中，間接反映香港身世的邊緣與混雜，行至九七問題逼近的 80 年代，李碧雲則以懷舊的方式尋找歷史。無論何者，並未直面商業與回歸的根本問題——殖民神話，董啟章故事新編洪水造陸以回應之，無疑在香港小說史中別具意義。

（一）回歸與回家：失落的樂園

首先分析〈永盛街興衰史〉銘刻的香港街道，如何由《地圖集》反思的殖民論述／眼光，轉變為凸顯家園想像。該文一開篇就先引用 1930 年抱殘百謬生發表在《探路燈》上的〈永盛奇葩〉，該文見證 20 年代的永盛街。〈永盛街興衰史〉試圖比較男主角有信在 70 至 90 年代經歷的永盛街如何不同於 20 年代。〈永盛奇葩〉描述 20 年代的永盛街雖然不是一條很長的街道，但因位處通衢大道，再加以店舖相連，遂吸引人潮來此逛街消費，平日即使到了夜晚，依然人聲鼎沸，遑論過節。由於每逢節慶，「邀往來省港之皮影或杖頭木偶戲班演出，蓋街上乃廣源客棧所在，因利而成便也。」⁷²由「因利而成便」可知，永盛街靠近三角「碼頭」，戲班下碼頭後，落腳地之一是街上的廣源「客棧」，此乃永盛街的重要特性，從而揭示〈永盛街興衰史〉鐫刻永盛街的旨趣：十九世紀至 60 年代來到香港的人們，始終把自己當成過客旅人，視香港為一座碼頭、轉運站或跳板，在這方借來的地方和借來的時間中，未曾把香港當成家，一如香港本身是英國的租界地。因此，〈永盛奇葩〉指出：「然毗近三角碼頭，宜於集合羈旅人士，此乃其氣氛獨特之所在。」（259）碼頭的氣氛獨特，呼應上文「因利而成便」，既是永盛街的地理現象，更是心理隱喻（上方畫底線處）。香港直到經濟起飛，第一批土生土長的港人在 70 年代成為社會的主要

⁷²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頁 259。後文徵引〈永盛街興衰史〉，僅於引文後標明頁碼，不另行作註。

生產力，才引領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行至 90 年代，人們更加成熟地探究香港性。由此可知，十九世紀至 90 年代是港人逐步思索和建構身分認同的「回家」歷程，這不但是〈永盛街興衰史〉的議題，也是香港文學的核心課題之一。

此外，〈永盛奇葩〉描述永盛街的繁華不如石塘咀，作此比較的原因是，兩地皆是填海之地：「街口之望江樓，創辦於光緒年間，初起於填海之地，歷半世紀，真可謂滄海桑田。」（259）石塘咀是香港最早的填海地，港英政府要求酒樓妓院遷居此地，振興商業發展。如果說妓院酒樓是城市填海地的換喻之一，那麼，妓院酒樓見證的人事興廢之喟，亦指陳城市歷史以滄海桑田為本質。滄海桑田的字義是海洋變成陸地，引申義是世事多變，歷史興替。有趣的是，字義符合殖民時代以降不斷填海造陸的政策，引申義則題解〈永盛街興衰史〉的篇名。〈永盛奇葩〉最終述說永盛街茶樓裏的歌姬杏兒最擅長演唱粵曲《客途秋恨》，而胡琴是演奏《客途秋恨》的主要樂器之一。因此，〈永盛街興衰史〉的開篇為了與〈永盛奇葩〉最末描寫的《客途秋恨》黏合，遂營造秋天蕭索、內心淒涼的氛圍，又以胡琴形容 90 年代的有信拉開老家大門的聲音，象徵揭開時光穿梭機的大門，同時也為〈永盛街興衰史〉帶出背景樂。全文以括弧來引用和穿插《客途秋恨》的歌詞，不但與小說正文呼應或對話，也像耳鳴般盤繞在有信的耳邊。有信在老家憑欄遠眺永盛街的夜景時，舉目所見，一片空寂，毫無人煙，迥異於 20 年代的繁華。

老家之所以使有信產生時光穿梭感的原因是，他和父母在六年前移民到加拿大，印證上文提及的視香港為轉運站：「大家原來也是過客。」（262）兩年前，有信回返香港，「這房子代表一種雙重的回歸。」（262）問題是，回歸香港與老家，能與回家劃上等號嗎？回歸牽涉到公領域中政治決策或社會施政等重大議題時，如何又是否切身地投映到人民心中？或者說，回歸中國的前夕，有信先思索該怎樣回歸香港與何以艱難。例如，有信兩年前甫出機場，就搭上計程車，孰料，司機堅稱沒有永盛街。由於永盛街周邊新建大樓，部分的永盛街也被拆除重蓋，未被拆的一小部份，如老家就被合併到永樂街。老家是 20 年代的建築，環繞在 90 年代林立的高樓大廈之間，備顯不合時宜，預告

他在老家和粵曲背景樂中考察永盛街興衰史的不合時宜。而他投入考察的原因是，剛返港時，因工商管理碩士的專業，很快就找到工作，顯示他貼合 90 年代香港社會的節奏。然而，不久後，卻深感找不到真正想找的東西，可見工商職業使他對香港性仍感到茫然又空缺，遂轉而投身歷史。厭倦工商是董啟章小說中常見的人物特質，看似不合時宜，卻提醒港人：沒有歷史記憶的社會脈動，無法貼合人心，亦即，以工商業為香港城的運作主調時，若不能自主地與歷史對話，城市及其商業將缺乏真正的活力，香港性難以真正地彰顯。

因此，有信開始蒐集文史資料，以期瞭解家史與城史，首先探究永盛街和有信的命名。誠如前文論及《地圖集》所言，更新史觀的切入視角是命名。先就有信而論，取名由來是因奶奶喜歡《客途秋恨》的歌詞：「涼風有信，秋月無邊。」

我從前從來也沒有留意過她唱的是什麼。這些曲子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的聲音，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全無意義。現在哪裏有窮書生和多情妓女的故事？……（案：現在）曲子常常悠然的在我耳邊響起，疑幻疑真，……它漸漸變成了這房子的低語，嫋嫋生命的回音。（272-273）

「另一個世界的聲音」，意指奶奶（嫋嫋）的世代和《客途秋恨》流行的時代，即 10 至 30 年代左右之於成長在 70、80 年代的有信，毫無意義。此中的諷刺在於，只要名叫有信的一天，只要有信生命存在的一天，只要奶奶的部分血液在有信身體裏流動的一天，有信認為沒有意義的奶奶歷史都如影隨形地跟著他。或者說，有信能真正擺脫他認為失義的奶奶歷史嗎？以上是有信返港前的矛盾。其後，「這房子的低語，嫋嫋生命的回音」，顯示返港後的有信意圖貼近奶奶生命的溫度，因此，我們必須瞭解奶奶喜歡的歌詞。「涼風有信，秋月無邊」，意指涼風依照約定的節氣，迎面吹來，月亮則高掛在遙遠的天邊。90 年代的有信想貼合奶奶的歷史，但根據歌詞，〈永盛街興衰史〉埋下的疑問是，奶奶的歷史之於有信，是迎面吹來的涼風，可以感受到涼度？抑或，奶奶的歷史是高掛在天空，可望不可及、難辨月亮裏的真相？簡言之，有信究竟瞭解香港歷史或與之有極大的隔閡，是小說後半部的課題；該文將男主角名為有信，

已預告他有很強烈的歷史不確定感，下文將剖析何以與何謂如此。

關鍵的例證是，爺爺的遺物中有許多與廣州老家魚雁往返的家書，家書宛如乾枯的秋天楓葉，而楓葉的意象，呼應小說開篇爲了貼近〈客途秋恨〉所營造的氛圍——歷史遺跡。有信原本認為家書是珍貴的家族史料，但父親主張不如燒毀，有信隨之也不得不承認家書之於弟妹或後人，毫無意義。於是，他點火燒毀家書，顯示他試圖貼合又有所隔閡，在不自覺的狀態中證明自己是香港的過客，考察香港歷史的意志仍不夠堅決與確定。循此引發的問題是：

大廳的古老掛鐘在抽搐的火光中指著四點半。這鐘老早已壞掉了，一直停在四時半。我蹲著不動，沒有去看擱在凌亂的飯桌上的鬧鐘。（案：家書）一片飛灰拖著一點紅色的星火，飄到半空中，迴旋、迴旋，才落到地上。（277）

當有信選擇遺忘城市史與家族史的關係，又該怎麼繼往開來和承先啟後地立足於香港？與其說蹲著不動、也不看現在幾點鐘，毋寧謂他在歷史長流之中遍尋不到時間座標，不知道何去何從，遂動彈不得。具體原因是，爺爺從廣州漂泊到香港，爸爸從香港離散到加拿大，使有信困惑家究竟在加拿大、香港或廣州，連帶也不知道身分認同該扎根或定位在何方。由此可知，歷史不確定感的癥結是，遺忘歷史記憶，以致無力梳理多條斷裂又重層的歷史脈絡，座標混亂，失家感於焉形成。

重要的例證是，有信從父系家族無法找到家與香港歷史的聯繫性，只好改從奶奶的生命脈絡找答案。

嫋嫋的影子，在她遺物間無聲款擺。……我撿起那些啞的瓶子，底部有「香港，中國」的文字，大概是戰前的產品。在搜索下去，竟然還藏著一個小時後嫋嫋買給我的玩具收銀機。……底部印著「香港製造」。嫋嫋存在的痕跡，就只有這些零碎事物的總和。不，我不能滿足於這些。（278）

引文的意涵有二。其一，奶奶一輩子生長和老死在香港，但她生養的兒子和繁衍的孫子有把自己當成是香港製造嗎？其二，「香港製造□□」，製造後方的

可填充性，具有無限可能，意指港人應思考能在香港創造和發揮什麼，倘若不如此，將淪為依附和隸屬的存在狀態，自主的能動權將消失。標誌「香港，中國」和「香港製造」的物件同時存在於奶奶的遺物中，而奶奶大半輩子經歷的是「香港，英國」，此乃暗示港人在三者之間，擺盪又掙扎，是建構香港身分的過程中，之所以滿懷不確定感的歷史糾葛。固然誠如危令敦所言，有信在南音的召喚中，迷離地陷入名存實亡與主體尚未構成的世界，但本文認為這何嘗不是使〈永盛街興衰史〉積極地面對歷史記憶的虛構與空缺，即直面殖民神話的論述策略，揭穿其中的虛構性，進而故事新編另一則神話，為虛構翻轉出新義與多層內涵。⁷³ 詳而論之，九七回歸的公領域政策與私領域的家究竟在何方，是一體兩面的課題，當公私界線模糊或互為投影時，英／港、家／港、中／港的邊界隨之鬆動，正是港人關注公共議題的契機——既批判香港與中國的淵源被殖民者遮蔽，回歸前後，又強調殖民經驗不能被掩蓋，甚至能從中轉譯出多元視野，如前文提及的海洋視野從向外拓展轉為：向內尋根又兼具與世界的互動。亦即，以家為出發點，在各項邊界與斷層中游移時，即或不確定又掙扎，仍縫綴出一張重層的歷史大綱。

例如，有信從地圖追溯永盛街的起源，於是檢視《地圖繪製史》，得知第一幅香港地圖是《砵甸乍地圖》，由首任港督砵甸乍於 1842 年繪製，永盛街尚未標記其中。畢竟，永盛街是填海而來的街道，最早被標記於《維多利亞地圖（1930-1945）》。根據龍炳頤〈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一文可知，十八世紀中葉，港英政府開始實施填海工程，以便建設房舍道路，發展商業，緩和港島土地不足的壓力。填海之前，政府與商人、英軍進行多年的協商，才得以實施工程。此時的填海工程，是以改善英人的居住品質為主要考量，至於對華

⁷³ 〈永盛街興衰史〉一文討論者眾，但還有文本細讀的空間。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九龍：花千樹出版社，2009 年 7 月），頁 263。危令敦：〈客途秋恨憑誰說？——論〈永盛街興衰史〉的香港歷史、記憶與身份書寫〉，輯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合編：《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77。

人的居住問題則採取漠視的態度。然而，華人人口稠密與樓宇面積少等因素，引爆 1894 年的大規模瘟疫等疾病傳染與衛生問題。凡此諸多原委，港府才有意改善華人住宅問題，訂立相關條例，迭經修訂而沿用至今。1890 年至 1904 年進行大規模的港島填海工程，如皇后廣場、油麻地、大角咀、紅磡等地，促成香港城鎮的急速發展與交通網絡的建立，⁷⁴ 而永盛街也是其中之一。〈永盛街興衰史〉：「填海工程在 1904 年完成，北岸擴展到干諾道，一座輝煌的城市就是這樣從茫茫的海中冒出來了。……但永盛街根本不可能上溯至 1842 年。」（264）港英政府透過學校教育和報章雜誌等論述途徑，強調香港歷史的起源是 1842 年，一方面試圖讓香港忘卻與中國的淵源，另一方面則企圖消解自身是侵略者的殖民形象。永盛街隱喻港口轉運站般的香港，卻不能上溯到 1842 年，這對殖民歷史論述的諷刺之意，昭然若揭。

換言之，從上述的龍炳頤研究可知，填海措施的緣起帶有殖民的不公平性，因此，填海造就的永盛街不可迴避對不公平性的批判——如殖民者對歷史起源的偏頗論述，即或如此，後續的填海工程仍帶動香港的發展，顯示英國殖民史已是香港歷史中不可切割的一環。

殖民地是毋須擁有記憶的。但在殖民地走向終結的時候，我們忽然醒覺到自己腦袋的空白，急於追認自己的身分，但卻發現，除了小說，除了虛構，我們別無其他的依仗。（271）

殖民地不需有記憶的內涵有二。其一，殖民者編造的集體記憶是人們所應抗拒。其二，其一的問題是，人們處於殖民環境中，極可能潛移默化地接受虛構的官方意識形態，以致於屬於個人的真實感受被取代和塗消。既然遺忘歷史記憶是虛構話語所致，作家也只能從虛構切入，才能找尋身分，由於小說一詞雖帶有虛構的本義，卻能述說大歷史中小人物最真實的感受。

先就填海造陸與地圖的關係，說明香港的城與史的特質之一為何是虛構，多義又歧異的虛構之於港人究竟是什麼內涵與癥結，本段最末將小結之。

⁷⁴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頁 211-250。



對地圖擁有最低限度的認識的人也會知道，這些虛線代表的是將要進行的填海工程，也即是城市的未來發展方向。這原是虛線這符號最膚淺而不足為奇的含義。但它卻同時為地圖語言的文法加添了一層複雜性，即除了一種永恆現在時式的宣示之外（也就是向讀者反覆重申：這就是一八八九年當下的維多利亞城），它亦同時具備了未來時式的指向（也就是：未來的維多利亞城將會是這樣）。而這兩個時式最終又難免同時被包含在過去的時間中，令人不能不自覺到時式（tense）和時間（time）之間的差異。在這差異中，我們窺見城市的虛構性（fictionality）。……推而廣之，維多利亞城也可以說是一個被虛構出來的城市。它是不斷地於地圖上用虛線勾畫出來的，永遠結合著現在時式、未來時式和過去時間的城市。⁷⁵

香港地圖包含實線（現在的地圖實況）與虛線（未來填海造陸後的地形）。然而，由於填海工程不斷，致使地圖中的實線其實是虛構的，虛線反而比較真實，猶如不斷修改和擴充的虛構小說不失真實。此乃揭示董啟章以「地圖／街道」為小說的敘事主題，既後設思考小說的創作本體論，亦烘托出香港歷史的本質。換言之，殖民地圖中，較為真實的虛線，其功能是含容「當下作為」和「未來發展」的雙重時間，但竣工後，包含此二時式的虛線成為下一幅地圖中的實線；同樣地，殖民者在地圖中勾勒的宏大論述，如引文中「未來的維多利亞城」將何等美好繁華，之於下一幅地圖竟弔詭地成為永恆的過去時間，虛構性難以遮掩。永恆的過去時間對殖民者標榜的現在式與未來式，作出強烈的嘲諷：英殖民者在香港建構的歷史論述，標榜前瞻的線性進程，無視／虛構香港的過去（殖民前的中國史），但此過去非彼過去（殖民者的宏大論述），卻又彼此含混。有趣的是，難以梳理與召喚的「過去」，無論隸屬哪一個脈絡皆以虛構為本質，此乃香港的城市特性。無獨有偶，〈永盛街興衰史〉描述永盛街在九三年的地圖上消失，劃入永樂街的老家在九五年化成瓦礫，地圖再

⁷⁵ 董啟章：《地圖集》，頁 78-79。



度翻新，九七年中資大樓興建後，又會是一番嶄新的地景，顯示「過去了」一樁又一樁，過去的歷史堆積層益趨繁複且各有質地，包括殖民前、殖民與回歸後，而這些不同的歷史脈絡在線性、回歸、回溯、斷裂等時間形態中，相互投映、牽扯又消解。

綜上，《地圖集》和〈永盛街興衰史〉旁徵博引許多文獻，嘗試考證香港歷史，卻推演出虛構的結論。根據以上所論，虛構的內涵包括混雜性與不確定性，至於起因是，有信從地圖考察永盛街的歷史起源，本是求索歸家之道，以期以起源貼合現在此刻的存有意義，但上段卻一再考證出「過去了」，顯示地圖溯源的成效不彰，只好追究之所以對歷史起源感到困惑的癥結：在海路上漂泊的過客心理。從海上來的，除卻移民，更有殖民神話，移民能否透過海洋新編一則攸關歷史起源的神話呢？這一方面與虛構的殖民神話同處於「神話」的平台，另一方面則賦予歷史起源不同的立足點——海與家的聯繫，不同於海烘托出殖民國的野心——「領地擁有權」。

在難以查證的歷史記憶中，對家的困惑感仍蔓衍至今。例如，奶奶的身分究竟是紅牌阿姑，或茶樓女招待？不僅如此，女友阿娟撲朔迷離地變換成各種時代的角色，時而歌伶，時而奶奶，時而卡拉 OK 女郎。⁷⁶ 不只有信困惑，有信也讓阿娟不安，她擔心有信不告而別地回加拿大，但這卻是她迷戀他的關鍵，顯示阿娟代表部分港人的過客／失家心理。因此，阿娟對光陰的睥睨，意指她不在乎香港歷史，文中至少兩到三次描述她推倒有信書桌上的史料，甚至有一回還踐踏史料（踐踏歷史）。沒有歷史記憶的阿娟猶如不會思考的行屍走肉，難怪文中多次形容阿娟睡覺時，呈現屍體的形象，或透顯死亡氣息。換言

⁷⁶ 董啟章認為卡拉 OK 是一種典型的香港娛樂，體現香港身分。「以普及文化來鞏固自我身分的不可侵犯性是一種對政治脆弱感的『積極』補償。但普級文化現象的『積極性』（意即文化現象並非靜態的『產物』、單純的『現象』，而是動態的轉移和推動力量）因素也同時是一種在政治無能感的前提下的消極的、瀕臨無望的邊俗的策略。」董啟章：〈自戀與懷想——卡拉 OK 現象探討〉，輯錄梁秉鈞編：《香港的流行文化》（臺北：書林出版社，1994 年），頁 71-72。

之，家能開枝散葉的綿衍性已然凋零萎謝，一如文中多次出現的乾枯楓葉與肅殺秋意。⁷⁷ 全文承此推向高潮的是，精采的超現實書寫：有信最終燒毀書桌上的歷史文獻和〈永盛街興衰史〉一文，火堆裏冒出的煙縷宛如魂魄，此前燒家書時也出現魂魄意象，無非象徵永盛街或香港歷史之魂。

大半年羅織起來的幾段繁華故事，一刻間化為火盆中的餘燼。火光熄滅，房子內籠罩著一層煙霧，令陰暗更見迷茫。在門縫透進的光柱間煙縷像魂魄般游離。……她不知道，還有一個晚上，她忽然掀被下地，……柔聲吟哦。……我害怕，一驚醒她，她便要摔下騎樓，粉身碎骨。(281)

引文中的空白，不免引發筆者參與想像：當煙霧瀰漫時，擬人化的歷史魂魄緩慢地走向阿娟的床邊，再躺進阿娟那行屍走肉般的身上，於是阿娟從床上坐起，開始夢遊——擬人化的歷史魂魄藉其肉身還魂，歌唱。此時，阿娟好似30年代的紅牌歌伶。然而，即使歷史還魂，終究是《客途秋恨》中哀哀泣訴的過客。或者說，香港歷史之於過客心理則呈現死亡狀態，否則歷史魂魄何必倚靠阿娟的肉身，才能還魂？

有鑑於英國以填海造陸捍衛的殖民神話，是爲了向世界自豪地展示一座商業繁華的樂園，但同時也埋下歷史詮釋的討論空間，〈永盛街興衰史〉遂以超現實的筆法，重構洪水造陸神話，反思歷史論述與樂園想像如何可能。鹿憶鹿比較南方民族、臺灣原住民、中原的洪水神話，歸納出該神話的再生意涵。

洪水的象徵同時指向死亡，也指向再生，洪水與洲陸的定期淹沒，似乎不必有原因，沒入水中不等於最終毀滅，是一種新創造、新生命或新人類的誕生。……洪水神話中都在強調洪水後有可利用的土地，也就是說，洪水後的大地是更好的，更適合居住的。洪水神話不是毀滅，是樂園重建的過程，是一種再生。⁷⁸

⁷⁷ 全文末段：「寒氣延著地面信步而至，竄進我的體內。……在教人微顫的涼風中等待那陰影的覆蓋。」(282)

⁷⁸ 鹿憶鹿：《洪水神話：以中國南方民族與台灣原住民為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2年），頁369-370。

洪水神話的核心特質是：「洪水後有可利用的土地」，以及毀滅而再生的變化過程。董啟章的小說經常出現圓形回溯的時間想像，卻未必能落實新生。先以明確描述洪水的《繁勝錄》為例，名為維多利亞的「我」，是大回歸時代的新生代，也是 V 城風物誌修復工作合寫者之一，顯示新生代以一片難以走出的歷史廢墟——殖民 V 城——為考古課題，但殖民 V 城以沒有起點與終點為特質，⁷⁹「我」在歷史考古中真得能獲得回歸與新生嗎？就另一方面而論，洪水淹滅殖民 V 城後，水底下的殖民 V 城發出母胎的隆隆音波，是生活在大回歸時代的人們所匱缺，備顯漂浮又失根，新生安在？

由此可知，《繁勝錄》以洪水及淹滅一切之後所形成的海水，隱喻時代洪流下的家國巨變，這仍延續為〈永盛街興衰史〉的核心課題，儘管後者並未描寫洪水，但在與〈客途秋恨〉互文時，不斷以曲詞中的海上意象呼應祖父至有信三代人在時代洪水中漂泊的心境：航海時代以降，殖民與移民交錯而成的顛沛流徙與愁情悲嘆。例如，「點想滄溟鼎沸鯨鯢變，妖氛漫海動烽煙」，有信解讀為英軍進攻廣州，佳人身陷兵燹，顯示〈客途秋恨〉以才子的苦戀寓託家國時局的艱困，致使當年望江樓餞別之際應允的愛情許諾，難以信守，遑論清末以降攸關香港的政治承諾。「在這個承諾賤賣，謊言大話裝飾成堂而皇之的偉論的時代，承諾本身不是已經成了一種諷刺嗎？」（268）這與「舊約難如潮有信，新愁深似海無邊」形成異代同心的對話。與其說承諾不可靠，毋寧謂挾帶各種承諾的時代洪流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襲來，是有信必須面對的現實。

〈永盛街興衰史〉故事新編後，造陸（永盛街）的神話色彩是，上文已論析的：超現實暈染 30 年代的歌伶藉由阿娟還魂，以期省思歷史洪流與招魂復魅（再生）。此外，全文具備「洪水後有可利用的土地」此一神話特質——「一座輝煌的城市就是這樣從茫茫的海中冒出來」（264），海隱喻造就航海

⁷⁹ 《繁勝錄》以通道之城形容 V 城，存在於過渡之中，無中心，無本質，非出發點，非目的地，沒有源起，沒有繼承；V 城與歷史的逆向旅程，航向茫茫的時空之海。（頁 35）

時代與海上漂泊的時代洪流，畢竟，沖擊諾亞方舟、或成就創世紀的洪水，何嘗不是隱喻時代洪流。尤其，全文思考與發揮洪水神話的作用：時代洪流下的可利用之地（填海之地永盛街）能帶給人新生嗎？鹿憶鹿指出神話作用是，洪水之後，新人類的誕生，對〈永盛街興衰史〉而言，毋寧謂，時代洪流與遞嬗中，新身分的建構。阿娟、奶奶、紅牌歌伶、茶樓招待撲朔迷離地交替還魂，令人眼花撩亂，反映香港身分的混雜，無法簡單化地成就古典神話中毀滅而重建新生樂園的純粹結構。這凸顯在殖民歷史魅影的籠罩中，難以割捨殖民者造就的商業文明與城市繁華，建構與解構神話備顯糾葛。就另一方面而論，古典神話的圓形時間是為了回溯起源／家，以安頓新生，顯示某種程度故事新編神話的〈永盛街興衰史〉，試圖以家思索歷史起源，有別於殖民神話以他者化／政治化的商業繁華與線性時間來定調港史起源。因此，儘管身分的混雜性與商業性有別於純粹的古典樂園，卻成就香港獨特的生命力，一如有信尋根家史的動力，後文也將說明去他者化的商業如何活絡香港文化。

其實，香港身分的混雜，由如何界定香港文學與香港作者的爭議，可見一斑。不論以在什麼地方生長、在港居住的年限、於何處發表文章作為界定標準，無不指陳香港文學與作家身分的含混性與邊緣性。

後殖民空間是一個非常混雜的空間，混雜的不單是它的歷史架構，還有它本身的主觀反應。後殖民的特色在於不同的歷史層面和歷史感時代錯置，交織糾纏，不易分割。⁸⁰

追根究柢，香港身分的混雜攸關空間特質，誠如梁秉鈞認為，香港的公私空間相互重疊、錯置而使界線模糊，因而難以區辨本土與外來、自我與他者、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文化與商業的邊際。⁸¹ 此乃說明〈永盛街興衰史〉何以

⁸⁰ 阿巴斯（Ackbar M. Abbas）：〈香港城市書寫〉，輯入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頁315。

⁸¹ 也斯：〈香港都市文化與文化評論（代序）〉，輯錄梁秉鈞編：《香港的流行文化》，頁9。

能相當好地融匯兩個敘事脈絡——代表大眾文化的粵曲《客途秋恨》，以及地圖文獻的嚴肅考證。亦即，「我」苦惱該如何「在殘卷佚篇的沉積中挖出他的形蹤」之際（78），歌聲繚繞的《客途秋恨》使我隨著歌詞樂聲，開展出對往昔永盛街的想像空間。

粵曲《客途秋恨》是香港追尋身分的經典文化符號，是在商業娛樂及大眾心理需求的基礎之上發展而成。無論是電影《客途秋恨》、《胭脂扣》，或文學作品，如劉以鬯《對倒》、也斯《剪紙》、施叔青《她名叫蝴蝶》、西西《飛氈》等，均引用此曲。許鞍華認為：「經典能夠超越時間性的問題，只因當下的時光有一種需要，或者『經典』一詞剛好迎合了觀賞者對於這個詞所依存的一切意義，而調節了眼光、心態。」⁸² 由於香港不可能自外於混雜的歷史現象——商業金融、影視娛樂和大眾文化，因此，〈永盛街興衰史〉以粵曲等通俗記憶，揭櫫香港身分籠罩在混雜性中。既然不可否認殖民神話標榜的商業金融已滲入香港性之中，香港小說該如何新釋商業與文化的關係，以期活絡香港的生命力，此乃董啟章的關懷。

（二）圖書館與廣場：文學虛構與公共議題

商業城市如何促進文化發展，文化場闖關注的議題為何，對此，圖書館與廣場是有趣的回應視角，這一方面是董啟章小說的主題，另一方面也能揭示董啟章投入香港文學的創作關懷。由於香港長期以來致力於經濟發展，以致於被輿論評議成文化沙漠。⁸³ 周蕾表示，香港的經濟商業與殖民性共存為社會結構，她從海港（port）一詞的英文語源學，說明香港的根源不只是亞洲進出貨品的集散地（entrepot），更重要的是：

⁸² 關詩珮：《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的小說》（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人文學部哲學碩士論文，余珍珠先生指導，2000年），頁91。

⁸³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29。

他暗示了香港轉運（transporting）功能，亦即香港扮演著的、在同文化間載運貴重物品和價值觀的角色。要把這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香港把自身建立為一個遍地機會（opportunities）的城市。如果香港能繼續身於世界城市文化的前衛陣營中，是因為他使攜動性（portability）成為生活事實。⁸⁴

轉運性或攜動性說明香港的能動性不只是貨物，更是文化，例如，董啟章〈圖書館與文化空間〉將圖書館定位成文化拓造的場所，而且，拓造之時，商業機制是不可迴避的論辯議題。⁸⁵亦即，商業與文化的互動，是香港城市性格的一環。一個間接的例證是，華商總會設立於1913年，旨在全面為華商服務，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1929年成立公眾的中文圖書館，收藏古籍以發揚國粹，並力求完備地收集各領域的圖書。依據歷年閱讀人數的統計可知，港人對圖書館的需求甚殷。⁸⁶由此可知，唯有正視香港的商業機制與文化場所，是既相對又相關的互動關係，才能使圖書館成為一個文化拓造的公共空間。阿倫特（Hannah Arendt）主張：

一個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會領域的興起，嚴格說來是一個比較晚近的現象，從起源上講，它是隨著近代開始的，並且在民族國家中獲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態。⁸⁷

非私人又非公共意指，抒發個人的小歷史、有別於官方的發聲空間，但又必須攸關能與城市產生互動的公眾議題，誠如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公共空間乃將私人意見轉變為公眾商討和關心的議題。

《地圖集》中〈眾坊街〉一篇，探討香港公共空間的現象與特質。

⁸⁴ 同註82，頁130。

⁸⁵ 董啟章：《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頁83。

⁸⁶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186。

⁸⁷ 阿倫特著、劉鋒譯：〈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62。

在一九七零年代之前，油麻地眾坊街稱為公眾四方街，論者謂「公眾四方」乃英文「Public Square」的誤譯，正確的譯名應該是「公眾廣場」。這廣場是指街上俗稱為榕樹頭的空地。入夜後江湖賣藝者會在此地聚集，占卦算命、唱曲講古。後來在改正街名的時候稱為眾坊街，便是取其公眾聚集場所之意。……事實上，一條名副其實、內在自存的四方街是沒有入口，也沒有出路的。於是，環抱在四方街中的廣場是一個封閉的廣場，而廣場的公眾性也同時是私人的。⁸⁸

人們在公共廣場關心私人性質的占卦算命或從事謀取生計的賣藝，而不關注公眾事務。這暗示港英政府僅能包容的是，與民間習俗相關的賣藝或集會，有關香港的重要方針未納入市民的廣場發言，更不是市民所能決定。其實，無論香港身為殖民子民或祖國公民，面對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協商九七回歸的事項時，卻沒有一位港人能參與其中，難以擁有表達意願的自主權。⁸⁹ 因此，回歸後出版的《地圖集》隱微地藉由引文，反思香港的公共事務。

就另一方面而論，關懷公共議題的虛構小說宛如廣場般的公共空間，使收藏小說的圖書館不是提供個人閱讀而已，而是讓公私領域能有效對話。例如，〈衣魚簡史〉、〈名字的玫瑰〉等以圖書館為舞台，前者描述一名男子參與香港陸沉前的歷史重整計畫，負責研究陸沉前的前代文學，遂來到被當成廢棄站的大學舊圖書館找資料。任職於圖書館的女孩，之所以志願來此工作，乃因其父是未實踐抱負且不知名的小說家，他不僅目睹文學消亡，甚至珍愛的藏書在一場大火中盡數焚毀。

⁸⁸ 董啟章：《地圖集》，頁 142-144。

⁸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一定要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恢復主權。然而，中英的談判歷程相當艱辛，經歷 22 輪正式會談和多次非正式接觸，主要爭議包括：主權與治權、設立中英聯合機構等問題。一九八四年九月，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在北京草擬聯合聲明，同年十二月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一九八五年五月，於北京互換批准書，聯合聲明自此生效。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頁 303-308。

我（女孩）知道這樣一個充斥著廢物般的書的地方，……對現在的我來說，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無論是沉在海底的舊城市，還是殘存在地面的重建起來的新城市。我唯一還不能肯定的，是自己對真正的性愛的需要。……它的快感和文字的快感有甚麼分別。……因為你同時也是個研究文學的。這是個不能錯過的機會。⁹⁰

女孩在圖書館工作，是爲了緬懷亡父所象徵的文學時代，並視文學時代為探索自我價值的心像世界。對女孩來說，無論是洪水中已陸沉的或洪水後新建的商業城市，一旦文學消亡，同樣是一片廢墟化的城市。簡言之，〈衣魚簡史〉藉小說家父親牽引出城市與文學的對話平台，別具意義的隱喻是衣魚（書蟲）。男子對衣魚感到十分恐懼，甚至將女孩的部分裸體視為衣魚，不禁產生心理障礙，致使性愛過程並不順利。由此可知，該文著力刻畫的性，是一場象徵活動——在文學已死的時代中，該如何尋找文字快感中的生命力與歷史視野。

最終，兩人疲倦地睡著後，男子夢見其身處於洪水來襲的圖書館。

在書架間開始滲出了水，然後水就匯聚成洪流般的湧動。我好像親眼目睹了城市如書架般高聳稠密的建築群在五十年前沉沒的景象。然後，一切沒入水底的碧藍色寂靜中。……我張開浸泡得如腐屍般蒼白皺皮的手掌，一個字也沒法捉住。⁹¹

圖書館為香港歷史的縮影，城市猶如一系列列展示歷史記憶的書架所組成。大洪水使城市面臨陸沉的危機，尤其，被洪水毀損的斷簡殘編與無法掌握的文字，向男子提問：該如何克服城市中文學亡失的難題，或者說，香港文學倘若沒有生命力和歷史視野，該如何與城市歷史對話。這戲謔地呼應男子的工作：「我只是想通過文學的材料而重組這個城市的某個早經磨蝕了的面貌。」⁹² 最終，「只剩下清澈澄綠的海」，畢竟，書寫香港文學史的艱難，是香港學界再三討

⁹⁰ 董啟章：《衣魚簡史》，頁 16。

⁹¹ 同前註，頁 21。

⁹² 同前註，頁 17。



論的議題之一。⁹³ 遑論香港文學與城市歷史等公共議題的對話，還有待文壇與港人投注更多的關心，才能為香港的商業發展與大眾文化注入生命力。此乃董啟章小說新釋洪水造陸神話的啟示，況且，奠基於填海造陸的殖民神話本攸關公眾事務。

又如，〈名字的玫瑰〉描述在全面電子化的圖書館世界中，紙筆書寫已極其罕見。第一人稱「我」的視角不斷在年長學者和女孩館員之間切換，形成鏡像關係：學者之於女孩代表知識，女孩之於學者則代表可觸碰的青春與現實。兩人彼此渴望又拉鋸，全文藉此說明知識與現實世界的互動，才是世界的名字，也是世界從創世紀以降的本質。⁹⁴ 同理，文學虛構也應與公共議題互動而形成表裏關係，之所以能夠如此的原因是，文學虛構具備彈性的論辯空間，一如篇名「名字的玫瑰」，帶給讀者不同的想像空間——符號與意符不斷地延異，多元的討論視野於焉形成。因此，董啟章中短篇小說的第一集以名字的玫瑰為書名，自覺或不自覺地揭示又預告他投身創作二十餘年的自我期許。

四、結 論

董啟章的小說將地圖從權力版圖或附屬殖民地，轉易成扎根土地的地方感，又將殖民者透過地圖來凝視香港此一命名權／書寫權／發言權，轉換成說故事的主動性與多元性，從而視地圖為可重新詮釋與考古的開放性文本／民族誌。亦即，說故事／小說虛構乃重新選擇論史的視角與路徑，賦予考古學以新議題，從而提煉出多元又混雜的香港性——歷史記憶、虛構文本、大眾文化、商業經濟等多維度的城市特質。此乃一改香港為殖民者的考古對象，殖民城市

⁹³ 例如，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黃繼持：〈關於「為香港文學寫史」引起的隨想〉，輯入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頁 57-90。陳國球：〈收編香港：中國文學史裏的香港文學〉，輯入《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頁 3-21。

⁹⁴ 「根據舊約創世紀，神以命名創造了天地。……真理：在名字之前，世界並不存在；在世界之前，也沒有名字。」董啟章：《名字的玫瑰》，頁 29。

與殖民神話才是港人的考古新議題。例如，將英國的海洋探險此一向外拓展的政治野心，演變成向內扎根本土香港，又不失世界格局，即或如此，仍強調殖民經驗是香港史中不可漠視的一環。由此可見，重構歷史與解構神話頗為糾葛，由於殖民神話標榜的填海政策與商業金融已滲入到香港性之中。為了使商業由殖民者的他者化轉變成增添香港性的活力，董啟章小說遂新釋洪水造陸神話：土地由權力版圖變更成家園歸屬時，涉及進化起源與回歸起源的時間辯證，從而揭示歷史起源的內涵、癥結與形式，乃以混雜與不確定的虛構為本質，尤其，賦予洪水造陸神話以新啟示：城市歷史、商業、大眾文化等公共議題與虛構文學形成表裏關係，一改殖民神話暗藏與窄化的虛構性。這正是董啟章小說在香港文學中的特殊地位，賦予城市的公共事務與歷史斷層／重層以積極性與主動性，再輔以東西方文學與哲學的視野，深化香港文學的視野與能見度。

本文討論董啟章的創作議題，仍延續至 2005 年成名作自然史三部曲，包括：地圖等歷史性的物質載體、洪水神話與城市文化的對話、由非常的自然空間展開物種自然與文明進化的交鋒，鄉土／本土香港與公共空間的投映關係。然而，自然史三部曲篤定地致力於探究香港的在地性，不同於此前的小說在眾聲喧嘩的他者論述中，困難又不安地思索該如何爬梳香港歷史與建構身分。例如，首部曲《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賦予工具性的物件以歷史關懷。之二《時間繁史·啞盜之光》疊合文學小宇宙與嬰兒宇宙，說明香港文學應具備的社會功能與儀式意義，以期包容重層的文化脈絡和錯置的歷史論述。之三《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強調港人應積極投入公共空間，才能關注香港的在地議題。尤其，以人與自然萬物的關係為喻，指陳「學習年代／過渡儀式／精神救渡」體現垂直型的世界觀。此乃以愛回應自我與香港社群的關係，不同於海洋殖民時代的水平世界觀，從而拆解政治變遷、大眾文化、消費文化所致的自利意識形態。由此可知，自然史三部曲涉及的論辯更形複雜，須由另文開展論述，但也說明本文分析此前的創作，才能瞭解董啟章創作旅程中一貫的關懷與變化。

引用書目

一、近人著作

- 也 斯：《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5 年。
- * 也 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 年。
- * 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 年。
- 王孝廉：《神話與小說》，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 年。
- 王 韜：〈創建華東醫院序〉，輯入香港東華三院董事局編：《香港華東三院百年史略》（下冊），香港：香港東華三院，1970 年。
-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 年。
- 李光雄等編：《歷史與文化：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文集》，香港：香港公共圖書公司，2005 年。
- 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6 年。
- 汪 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
- * 周 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
- 林藍馨：《想像世界的宇宙獨裁者——董啟章小說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學碩士論文，胡衍南先生指導，2010 年。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合編：《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胡金倫：〈獨裁者坐在文字工場裏騎旋轉木馬〉，《聯合文學》23 卷 6 期（2007 年 4 月）。
- 施叔青：《寂寞雲園》，臺北：洪範書店，1997 年。
- 施叔青：《遍山洋紫荊》，臺北：洪範書店，1997 年。
- 姜德明主編，小思選編：《葉靈鳳書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

- 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出版社，1993年。
- 陳清橋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 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九龍：花千樹出版社，2009年7月。
- 莊孔韶主編：《人類學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 莊孔韶主編：《人類學經典導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 許琇禎：〈回歸女性本質的烏托邦建構——論董啟章〈安卓珍妮〉的雌雄同體意識〉，《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29期（1998年5月）。
- *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 * 梁秉鈞編：《香港的流行文化》，臺北：書林出版社，1994年。
-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
- 鹿憶鹿：《洪水神話：以中國南方民族與台灣原住民為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2年。
- 黃鈺萱：《臺灣文學場域中的「香港」：以鍾曉陽、西西、董啟章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陳建忠先生指導，2011年。
- 黃雅蓮：《香港文學與文化身分：以劉以鬯、西西、梁秉鈞為個案的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黃錦樹先生指導，2011年。
-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
- * 董啟章：《地圖集》，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7年。
- 董啟章：《安卓珍妮》，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0年。

- 董啟章：《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
- 董啟章：《衣魚簡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 董啟章：《繁勝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
-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
- 趙稀方：《小說香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 詹志勇：《細說洋紫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
- 鄒文律：《城市書寫：董啟章小說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碩士論文，樊善標先生指導，2006年。
- 鄒文律：〈人與物件的時光之旅——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年12月）。
- 葉靈鳳：《葉靈鳳卷》，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
- *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
- * 關詩珮：《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的小說》，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人文學部哲學碩士論文，余珍珠先生指導，2000年。
- （美）喬治 .E. 馬爾庫斯（Marcus, George E.）、米開爾 .M.J 費徹爾著，王銘銘、藍達居譯：《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 * （美）喬瑟夫·坎伯（Campbell, Joseph），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立緒文化出版社，1997年。
-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 .E. 馬庫斯編，高丙中、吳曉黎、李霞等譯：《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美）戴維·哈維著（Harvey, D.），胡大平譯：《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 （德）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國家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

- (羅)伊利亞德(Eliade, Mircea)著,楊素娥譯,胡國楨校:《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1年。
- Calif Berkeley,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 Nadia Abu El-Haj, *Facts on the Ground.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and Territorial Self-Fashioning in Israeli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DOI:10.5860/CHOICE.30-0736
- Robert Rosenthal, & Lenore Jacobson, *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 Irvington, 1992).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ampbell, J. (1997). *Qian mian ying xiong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Zhu K.-R., Trans.). Taipei: New Century.
- Cassirer, E. (2003). *Guo jia de shen hua [The myth of the state]*. Beijing: Huaxia.
- Chow, R. (1995). *Xie zai jia guo yi wai [Writing diaspor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ng, Q.-Zh. (1997). *Di tu ji [The atlas: Archaeology of an imaginary city]*. Taipei: Unitas.
- Guan, Sh.-P. (2000). *Xiang gang de cheng zhang gu shi lun shi shu qing yu dong qi zhang de xiao shuo [Writing stories of Hong Kong: Shi Shu Ching and Dung Kai Cheung's fic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Division of Humanities,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 Leung, P.-K. (Ed.). (1996). *Xiang gang wen hua kong jian yu wen xue [Cultural space and literatur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Youth Literary.
- Liang, B.-J. (1994). *Xiang gang de liu xing wen hua [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 Taipei: Bookman.

- Liu, Sh.-Y. (2009). *Jian ming xiang gang shi* [*A brief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Joint.
- Wong, W.-Ch. (1997). *Li shi de ou ran cong xiang gang kan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shi* [*Historical contingencies: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i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M.-J., & Zhu, Y.-W. (Eds.). (2002). *Xiang gang wen xue @ wen hua yan jiu* [*Hong Kong literature as/and cultural stud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